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7月15日第12期 总第135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35期

## 江青研究专辑

### 目录

#### 【专稿】

阎长贵 江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漫议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

#### 【江青研究】

启之 江青与电影指导委员会

韦陀 蓝喷不是蓝苹——江青笔名考

#### 【江青看片】

瀑下 《瑞典女王》：好莱坞的异数——江青崇拜的影星葛丽泰·嘉宝

船六七 《红舞鞋》的诱惑——江青最常看的电影

#### 【评论】

余汝信 关于维特克的《江青同志》——答台湾某学者

阎长贵 我看《江青同志》一书——关于余汝信对此书的评价

沈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 《江青同志》与“引文学”

#### 【文摘】

丁凯文 也谈维特克访华与江青

余汝信 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文革史读书札记之二

#### 【版权声明】

【专稿】

## 江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 ——漫议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

阎长贵

蓝苹是江青二十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艺时的艺名，虽然她从艺时间不长，但很快进入明星行列。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变成一个口含天宪、震惊中外的大人物，“搅得周天寒彻”。文革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非研究不可的一段，而要研究文革，江青是绝然绕不开的人物。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样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镌有江青印记和痕迹。江青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几十年来，关于江青的文章和书籍很多，说不上汗牛充栋，也是难以统计；从内容上讲，有编造故事詈骂江青的，即丑化和妖魔化江青的，也有赞扬和吹捧江青的，即美化江青的——说实在的，严肃和实事求是地叙述和评价江青的文章和书籍还不多。对这两种倾向和做法我都不赞成，我想客观地评价江青，——我是否做到了，不敢说，这要由广大读者评论，但从主观上说，我是努力这样做的。

### 一、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 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江青政治生涯的重头戏发生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和江青是夫妻，而在文革中，他们的关系基本上是政治关系。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看到和听到过，江青经常自称代表毛问候群众，在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时，她一天不知说多少次：“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据江青最后的一位护士说，就在毛逝世的前几天，江青到小靳庄还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想主席不批准我能来吗？”——毛明明说了：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仍然这样说。这次在小靳庄，她还叫邢燕子、侯隽两人代表青年给主席写信，并说：“你们在信封上写江青同志

转交主席就可以了。”

江青在文革中经常向人说通过她可以向毛主席反映问题，她也确实帮忙反映过问题或转送过材料。如1966年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会议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通过江青向毛递交了反映他们受压的信和他们写的两篇关于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毛8月1日即给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而又后果严重的信——这是毛“点燃‘文革’的一把火”，正如毛自己所说：“……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

在文革中，江青就是这样精心地利用和毛的夫妻关系，抬高她自己的地位。有人说，江青作为毛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一点不假。“狐假虎威”，这在江青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江青在文革中做了很多毛并不一定知道的坏事，如逮捕关押三十年代她在上海时，待她很好的保姆；迫害文艺界或其他领域的这个或那个人；尽管这些事情本身她不一定报告毛，她还是依靠和利用了毛给她的地位和权力即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以及毛发动文革所造成的氛围和环境。

毛对江青怎样？毛点燃文革的第一把火，即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背着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实际上即背着整个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没想到的顽强抵制；毛的性格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发动文革的他，又出新主意。这就是，他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特长，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在这个《纪要》的标题上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这是毛发动文革很重要的一步棋——其重要意义就是把林彪拖上文革的战车，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使她成为党内外、军内外都十分瞩目的人物。

毛为了发动和开展文革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政治局）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或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文革的专门机构，并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掌控中央文革小组。

毛在文革中对江青极其信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讲“黑话”（毛泽东语），和1967年8月4日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

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和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而江青也不负毛的“厚望”，毛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江青都是积极响应，全力执行的，所以毛称赞江青在文革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当然，毛对江青也有不满的地方，也不时地批评她，甚至还让政治局开会批评她，但他对江青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这从他请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而后又告诉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的话语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来。

在文革的中、后期，李讷和江青经常吵架，在吵架时，李讷不止一次地对江青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有那个本事！”又说：“武则天坐天下，还有一些文武高官支持，而谁支持你啊？”我看，这话只有她的亲生女儿李讷敢说，恐怕连毛远新都不敢说。不过，我觉得，李讷反复这样说也是传达她爸爸的意思。大概就因为这样，即江青既没有武则天的本事，也没有武则天的“人脉”，毛最终没有把大权交给她（毛原来可能有让江青接班的打算）；但尽管如此，江青作为坚决维护文革的人，视文革为命根子的毛对她还是十分信赖的。毛从来，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要打倒江青，连一点这样的意思也没有。1976年10月华国锋等领导人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本来是顺应民意、违反毛意愿的行动，但却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时这样说，显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

毛从来没有要打倒江青。江青对毛也是忠贞不二的。在说到江青和毛的关系时，江青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中说：“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就从1966年5月16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主席。”在最后的陈述中，她又说：“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江青辩护和陈述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关系的真实写照。

毛对这条狗在文革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爱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为毛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的话。江青自杀时留下的遗书说：“主席，您的学生跟随您去了！”

无数事实证明，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但多年以来，迄今仍然这样，有人说毛是毛，江是江，甚至说江和毛“背道而驰”，即把江说成反毛的人，这样说符合事实吗？

## 二、从蓝苹到文革中江青有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

江青在文革中作恶多端。那么，她年轻时就是一个坏人吗？我认为不能这样说。

江青，并不是她的本名，而是她1937年到延安后所选用的一个名字。她童年读书时，老师给她起的名字是李云鹤。这个名字一直叫了20多年，上世纪30年代到上海后，为了做地下工作方便她也叫过其他名字，写文章还用过这样那样的笔名。江青出身低微，其父是一个开旅社的店主和做大车轮子的木匠，江青自称“轮人之女”。江青1933年离开青岛到上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又离开上海去延安。如何认识江青在30年代思想和行为，是全面和正确认识她的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

江青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30年代的革命经历，经常向人讲她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我在担任江青的秘书期间，她也向我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30年代的另一一些情况，对了解和涉及她30年代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使很多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残。她仅在这方面的罪恶就擢发难数。然而客观地、历史地讲，同其他年代如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相比，江青的30年代是最值得肯定的，它是江青的“黄金年代”。而江青为什么对她30年代的某些情况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来又成为大人物的共同的变态心理。

实话实说，江青在30年代，主要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总的来说，此时的她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

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安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江青所走的道路，是当时追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个30年代的报道和宣传都是负面的，这不符合事实。

国际友人白求恩对江青的一段描述值得注意。1938年，白求恩为支援中国革命来中国后，曾于3月底到5月初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况，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延安的长文，其中他讲的最典型的一个人就是“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情况下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这大概是西方媒体最早出现的关于江青的报道。从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青到延安后是非常活跃的，而白求恩在延安停留时看到的江青，还没有和毛结婚，他也不一定知道江青和毛在谈恋爱。

我认为，江青从一个革命的进步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比江青小两岁、在30年代曾是江青朋友的画家郁风说：30年代，“我印象中她（指蓝苹，即江青）非常敏感，说话时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在生活中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一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许多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谈虎色变，说她从早就是个野心勃勃、阴险狠毒、自私无情、虐待狂、玩弄男子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看出来……蓝苹远远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郁风这个说法，客观、深刻，入木三分，是

知情人的真知灼见、仿佛还没见别人这样说过。

### 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

1938年11月，在延安江青和毛结婚。文革后出版的非常权威的书说是毛“错误的选择”，“失败的选择”。显然，这不是历史的观点。这种“逆推法”没什么意义。就因为江青在文革中成为历史的罪人，毛在30年代选择江青做伴侣就是“错误”和“失败”的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观点，也没有一点发展变化的眼光。要知道，毛和江青都是发展变化的。回到30年代，即毛和江青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是革命领袖，江青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何不可？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毛和江青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即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青曾经是在旧社会让人看不起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青的过去，毛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同江青的结合。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

现在很多人都说，江青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的垂青。这可能是事实。电视剧《延安颂》也是这样表现的。文革中一次看电影时，江就曾跟我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这句话很到位，值得玩味。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写的《毛家湾纪实》和我与杨银禄写的《我给江青当秘书》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青外，包括周总理（他是会议主持者），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信上说，“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会者，除了江青，包括周总理全都签了名。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学习。对这封信，毛不仅画了圈，而且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对江青《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实实不在乎许多人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的那些理由。

再从江青方面说，应该明确，就是从婚姻上讲，她也并不是为着追求毛才到延安去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青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而当



时追求毛的，也不只江青一个女青年……如此等等，情况纷繁复杂。一句话，我们看待毛和江青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心。

关于江青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没有“约法三章”？

翻阅文革后大量有关江青和毛的传记文学、纪实作品，在谈到他们结婚问题时，很多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青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江青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必须指出，这是以讹传讹。

12年前，我在《党史博览》上发表的回忆和研究文革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和一些先争论这个“约法三章”问题，他们说有，我说没有。我和他们争论了七八年。现在，更权威的人有了更权威的说法。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的说法。

其一，文革研究专家金春明说：他可能是在公开报告和文章中较早谈及“约法三章”的人。1984年7月，他在海军作文革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的报告，曾言：江青和毛结婚，“中央规定她的任务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她参加政治活动。”这个报告的录音整理稿经海军政治部印发后，在全国很多地方翻印，流传较广。大概由此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

1985年7月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办公厅，传达了杨尚昆的指示：“党校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很好。听说现在要出版，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说当时中央有个决定，可以结婚，但江青不能参政。我找了几个老同志问了一下，都说没有这回事。我自己也不记得有这个事。请出版之前，将这个问题核实一下。”此后，根据这个指示精神，金春明在他的文章和讲课中，都不再讲“约法三章”。

其二，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她的书写篇序言，刘英亲自带领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到杨尚昆的家中。

杨说，在延安，毛主席最忌恨张闻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他看到过张闻天综合很多人反对毛和江结婚的事，写给毛主席的信。

毛收到这封信，很生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说：“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杨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

杨说，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他曾经问过陈云：“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陈说：“根本没有那回事。”

杨说，陈云告诉我，当江青和毛结婚后，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

江青把这事告诉了毛，毛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杨尚昆如此执着地关心所谓江青和毛结婚中央是否有“约法三章”的事，坚决地一再地否定这件事，实在令人感佩。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应该认真地向他学习。在这个问题上再也不要以讹传讹了。

#### 四、建国以前的江青应受到肯定

江青和毛的夫妻关系，从1938——1976年，存续了38年，应该说是始终不错的。毛不止一次跟别人说：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很有帮助。江青也自诩是毛的“流动哨兵”。江青直言，她和毛是“政治夫妻”，诚哉斯言！江和毛之所以给中国人民造成危害，不在于他们结成夫妻，而在于他们结成了政治盟友。

江青和毛作为夫妻，在4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毛和党中央率领军队转战陕北时，江青一直跟随在毛身边，担任中央直属支队的政治协理员，做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有时还帮助毛起草文件和报告稿（毛口述，她记），作为中央领导夫人一级的女同志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江青最光荣的一段经历。江青没经过长征，这是她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大姐”相比时的一个弱点；但她常以随毛转战陕北自豪（甚至“骄傲”和鼓吹），大概人们都记得在法庭上，江青对坐在台上审判她的人说：“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转战陕北时，江青一直留在毛身边。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描写转战陕北的电影《巍巍昆仑》虽然有毛骑马行军的画面，在这个历史画面中也骑着马的

江青紧随其后，然而，这个电影不仅没有提到江青的名字，连一个正面镜头都没给她，实在不应该。

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可能长久被掩盖和歪曲。与《巍巍昆仑》不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时，中央一台播放的由王朝柱编剧的50集电视连续剧《解放》，就用不少镜头和情节——有些是很重要的镜头和情节，如毛嘱咐江青好好照顾周恩来，在窑洞口或门口，迎接黄炎培、陈毅等，正面表现江青；是否做得完全到位，不必去说，但这样做——敢于这样做，就是尊重历史的表现。该剧播放后，王朝柱先生说：这是32年来江青第一次以正面人物出现。王朝柱先生这样做，意义非同寻常。它表明建国前的江青是应该和值得肯定的。

## 五、江青崛起于“大跃进”失败后的六十年代

江青在50年代，除了“带队”做过“武训调查”和积极参加过批判电影《武训传》，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不多，因为她身体一直不好。从1949年算起，在七八年内，江青曾四次到苏联治病。江青崛起基本上是在60年代。这和毛所遇到的政治形势有关。毛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了，他和处于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发生分歧——很大的分歧，他认定产生了“修正主义”，他感到孤立，要寻找新的政治合作者和支持者，即能和他一起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找到了江青。

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修改、定稿的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在这十六首词中，毛最欣赏的是《沁园春·杭州感事》，其结句：“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是出自毛之手笔。“诗言志，歌咏言。毛所以这样修改胡的诗词，反映和代表了他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心态。胡原词为“天共我”，毛将“天”改为“谁”，变成了“谁共我”，这不是清清楚楚表明他在找人吗？

应该说，他找着了，找对了，能够与他相“共”的，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妻子江青——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也应了古人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遴选根本政治合作者和支持者方面，江青进入毛的视野。这是江青在60年代崛起的根本原因。

江青崛起的第一个大行动，就是从1962年起搞“京剧改革”。

大家知道，在1963年和1964年，毛关于文学艺术工作有两个批示。

一个是，1963年12月12日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个是，1964年6月27日的批示：

这些协会（指关于文学艺术的各种组织，如文联、作协等等——笔者）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是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根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文学艺术工作所做的严厉批评。江青搞“京剧改革”，就是根据毛的批示精神做的——追溯远一点的话，也就是贯彻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具体地说，江青表示，就是要在舞台上使工农兵的形象代替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形象。她1964年6月23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保卫着国防前线，但是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对江青这个讲话，毛批示：“讲得好。”

大家都知道，文革中八个样板戏垄断、统治舞台和荧幕。对江青搞的样板戏

怎么看？这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我觉得，不必讳言和否定江青在京剧改革中做的工作，她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些智慧和力量的。我亲眼看到，江青在用餐时，经常听所谓“样板戏”的唱腔，她反复说“十年磨一戏”，即一个戏要不断地改，等等。

对这一点，业内人士有不少肯定的评论。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个在《沙家浜》中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虽在文革中被江青整得遍体鳞伤，而在文革后仍然说：“平心而论，江青还是懂艺术的。”著名作家《沙家浜》编剧汪曾祺，曾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而其才华为江青赏识，在京剧改革中受到“重用”。他自称“唯一可以在江青面前翘二郎腿和抽烟的人”。他真诚地认为：江青在高层领导中比较懂戏，对京剧比较内行，唱词好坏有鉴别力，有些话能说到点子上。比如《沙家浜》的“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人的戏，胡传魁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在上世纪50年代就说江青是他的“知音”。研究京剧艺术的著名学者章诒和女士评价江青说：“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内行。”但必须指出，把京剧改革的所有功劳通通归在江青身上，那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而吹捧江青搞京剧改革在文革中却是一种时髦。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1966年7月24日，即文革开始不久，在广播学院讲话，说：“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郭沫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时，朗诵了他献给江青的一首诗，其中写到：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

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着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江青就是凭借着京剧改革这座“平台”、这个“阶梯”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或前台），又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她年轻时朋友郁风的话说：“演出（了）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 结 语

江青在文革中的思想和行为，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粉碎“四人帮”后，她和同伙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何让这样一个显赫一时的政治人物，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还是一个需要花大气力研究的课题。

江青从演员蓝苹，一步步演变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江青，其过程、轨迹、原因是什么？简单地说，我有三句话：环境改变人；权力腐蚀人；外因起了主要和决定作用。■

## 【江青研究】

## 江青与电影指导委员会

## 启 之

建国后，江青的第一个党政职务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她管电影，是从电影指导委员会开始的。

电影指导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7月11日，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7月12日《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消息，公布了委员会的名单：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任主任委员，委员有周扬、丁西林、沙可夫、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陈波儿、李立三、陆定一、钱俊瑞、廖承志、肖华、蒋南翔、徐冰、邓拓、刘格平、张俊祥、沈兹九、丁玲、艾青、老舍、赵树理、阳翰笙、田汉、洪深、欧阳予倩、曹禺、李伯钊、江青、周巍峙、王滨等32人。

这个名单包括了宣传、文化、工会、统战、新闻、教育等中央各部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负责人，以及文艺界和电影界的著名人士。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有关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sup>1</sup>

江青在这个大杂烩的名单中，叨陪末座，排在第30名。但是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会议的排名，会让江青心里舒服很多——即使与会者最多的时候，她的名字也没有排到第五名之后。而一般情况下，列在第三位的时候居多——跟在后来成了她的冤家对头的周扬之后。

这种会议前后举行过十次，如果不算列席的，正式的与会者多则13、4人，少则6、7人。而从始至终参加会议的有两个，一是周扬，一是江青。

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导因是因为一部电影——东北厂出品的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内蒙春光》违反了民族政策。<sup>2</sup>有鉴于此，周恩来提议成立这么一个机构。

但是，这个集文艺精英和意识形态把关人于一体的委员会，却因成员庞杂、

<sup>1</sup> 《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

<sup>2</sup> 此片于1950年春上映，一个月后停映。后经过修改，并由毛泽东将其片名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于1951年重新上映。见于学伟文《由〈内蒙春光〉到〈内蒙人民的胜利〉》，载《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人数过多，且人人各有所营而难以开展工作。从1950年7月到1951年4月，在9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委员会形同虚设。

1951年3月24日，周恩来主持的电影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地点在中南海西花厅。参加者有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阳翰笙、丁西林、周扬、夏衍、江青、袁牧之、陈波儿、蔡楚生、史东山。下面是档案留下的会议内容：

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问题，为了加强对电影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必须：

1、由中央宣传部提出名单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研究有关电影工作的思想性政策性问题。

2、中央公布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此决定由周扬召集会议讨论起草。

3、改变现有的电影机构，以加强电影思想政治领导的需要。

二、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做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群众，由中宣部电影工作指导委员会计划于四月召开座谈会，对上述二部片子组织讨论与批判。《新电影》和《人民日报》发表批评《武训传》的文章，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导演孙瑜先生谈通。

三、组织创作力量。

会议形成了《加强党对电影创作领导的决定》的文件。

1951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对《武训传》的全国性的讨论和批判，加强电影工作的领导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委员会决定成立常委会，由周扬、丁西林、沈雁冰、江青、肖华、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为常委，同时，决定成立上海分会，由夏衍负责，刘晓、舒同、潘汉年、于伶为委员。至此，电影指导委员会才真正发挥作用。

1951年4月21日，电影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一、确定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常委会，并由周扬、丁西林、沈雁冰、江青、肖华、袁牧之、陈波儿、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为常委会常委。



二，成立上海分会，夏衍负责。

三，电影审查：新片的禁演问题必须由电影指导委员会审查决定，旧片的禁演由电影局文化部备案即可。

这个委员会最大的作用就是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运用到电影创作之中。委员会提出的口号是“写重大题材”和拍“工农兵电影”。前者要求电影创作反映诸如土改、抗美援朝一类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后者要求电影只能表现工农兵，“甚至对工农兵生活的范围加以限定，仅止于生产劳动和战斗的过程”。<sup>1</sup> 这种片面性、极端性的提法对创作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的环境和社会心理也为这种提法提供了理由——在《内蒙春光》、《荣誉属于谁》<sup>2</sup>和《武训传》三部电影接二连三犯了错误的情况下，电影指导委员会难免矫枉过正。另外，在《武训传》批判和文艺整风的紧张环境中指导电影，不能不如履如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心理不仅存在于专业人士之中，也同样存在于审查者身上。矫枉过正容易走极端，谨小慎微就势必要提高门槛儿。上述提法的出现，就是这两者相加的结果。

在1952年7月被解散之前，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常委会开了十几次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审查剧本或剧本提纲，二是制订题材规划，三是处理与电影有关的业务，如选定参加国际影展的片目、向电影厂宣布工作纪律、总结工作等。在这三项工作中，审查剧本和剧本提纲、提出处理决定和意见，是常委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sup>3</sup>

不妨举几个例子。

<sup>1</sup> 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册，第7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sup>2</sup> 1951年4月17日，周扬在电影局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时说：“（此片）对于中国革命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的传统作了错误的描写，在根本上错了。”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8—19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当时无法公开是因为此片涉及到党内斗争和中苏关系。据孟犁野分析，“其问题主要出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影片将革命荣誉归属于学习苏联经验（新的调车法），是政治错误；二是影片片名采用了高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长文《荣誉是属于谁的》，内容又系高岗任主席的东北人民政府属下的铁路局的事迹，而此时高岗的反党活动，虽然尚未公开揭露，但已为毛主席所察觉。”关于学习苏联经验的政治错误，孟注：1967年10月11日出版的第30期《铁道红旗》，上面刊载的一篇批判《荣誉属于谁》的文章说，毛主席当时指出《荣誉属于谁》是一部“歪曲中国革命历史，丑化党的干部”的影片。这篇文章还提到另一位中央领导看了此片后也说：“将荣誉归于一个采用苏联调车法的干部，这是政治上的错误。”文章说，江青在此事后不久成立的“电影指导委员会”上对此片也有过多次批判，说它是“反现实的形式主义代表作。”《铁道红旗》上这篇文章所透露的上述信息，同周扬1951年4月17日讲话中关于此片“问题”的说法，字句虽有不同，但精神实质大体一致，足以帮助我们解开《荣誉属于谁》被“停映”之谜。在文革时期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人们对待中央领导人的言论极其慎重，绝不敢随意编造，否则便会招来灾祸。因此，这篇文章所披露的史料应该是可信的。

<sup>3</sup> 见《电影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到第十次会议记录》，文化部存档资料。

在第三次会议上，常委会对赵树理写的电影文学剧本《表明态度》做出了这样的处理意见：故事梗概是可以成立的，但必须作很大的修改，修改时应注意：

1. 剧中把一个消极落后的村干部作为主人公是不恰当的，其“主要人物应该是对扩大农村生产带有决定性的积极分子”。
2. “单单写农村的变工互助是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因为这种生产方法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但变工互助比单干对农民有利。应说服群众，一方面组织起来，一方面还要深耕细作，不但对个人有利，也对人民有利。同时，也不应单方面只从经济上鼓励农民互助变工。”
3. 将剧本中的几个次要人物改成主要人物，将原来的主人公“作为教育对象来描写，但也不要写的太生硬……应以蓬勃的爱国主义运动与农村中新的生产热潮以及支部有力的活动来刺激他、感染他，使他合情合理的转变过来。”<sup>1</sup>

在第九次会议上，常委会做出了对剧本《六号门》的处理决定：基本通过。导演的准备工作即可开始，并应争取在今年拍摄完成。但须根据今天本会所提之意见修改。意见共十条，下面简述比较重要的五条：

1. 剧本中所反映的解放后搬运工人的自发斗争显得孤立，无领导。应该增加表现比较高级的党与政府机关的领导。这样可以加强群众运动与政府领导的联系。
2. 解放前与解放后的描写在剧本中的比重几乎相等，因此减弱了今天新工人运动的描写，应将解放前的描写酌情删减，加强表现解放后的工人斗争。
3. 加强性格化描写，如解放后工人称呼封建把头仍是马大爷、马三爷，不妥。
4. 郑经理是个私商，从私商的角度来反映封建把头制的不合理是不妥当的。
5. 加强描写我军围城时期的工人斗争。<sup>2</sup>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常委会对剧本的审查完全从政治需要和政策概念出

<sup>1</sup> 这次会议的出席者是周扬、丁西林、江青、袁牧之、蔡楚生、陈波儿。列席者是钟惦棐、王震之，记录者是汪岁寒。见《电影指导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记录》，1951年5月16日，文化部存档资料。

<sup>2</sup> 这次会议的出席者是沈雁冰、周扬、江青、袁牧之、蔡楚生、陈波儿、吴锡昌。列席者是钟惦棐、王震之、陈明、吴祖光、林蓝、汤晓丹。记录是汪岁寒。见《电影指导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记录》，时间不详，根据有明确时间记载的会议记录，可以推断，这个常委会每隔半个月开一次会。第七次会议是1951年8月2日召开，第十次是9月6日召开，由此推断此次会议应在1951年8月下旬。文化部存档资料。

发，远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按照它的意见修改，得到的只有公式化和概念化。常委会要求赵树理把《表明态度》中的主人公从消极落后的村干部换成积极先进者，其逻辑显然是，凡是村干部都是积极先进者。常委会关于变工互助、单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生产热潮等等的大道理，基本上是对创作有百弊而无一利的空洞教条。对《六号门》的意见也一样，常委会先验地认为，只要工人起来斗争，就一定会有党来领导；我军围攻城时，城里工人就一定会响应；只要同属剥削阶级，就不会有利害冲突，所以不能从私商的角度来揭露封建把头；只要一解放，上百年几辈子养成的习惯就会在一个早上消失干净，见了把头，工人就会挺直腰杆，直呼其名……

两年之后，电影局局长蔡楚生对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做了这样的总结：“51、52年由于创作上的领导同志脱离实际的领导方法，不顾作家能做到什么，也不顾观众对我们作品如何迫切要求，而对一些新的作家提出了空洞不切实际的创作要求，使创作遭到严重的窒息，被否定的剧本提纲四百余件，成品八十余件，剧本四十部。在这样的影响下，老生、新生力量全部受到挫折，对事业造成无可限量的损害。”<sup>1</sup>

新时期以来，电影界对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做了否定性评价，曾经共襄其事的钟惦棐认为江青应对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负主要责任：“而江青作为成员之一，却一度操纵电影剧本的命运，以各种口实否定一个又一个的剧本。你写艰苦奋斗，她就说是宣扬战争残酷；你写英勇牺牲，她又说这么好的人怎么能死；你写妇女劳模，她说这种劳动不适宜女人；你写外交之战，她又说某某人当时主持此事，不能写。名曰电影指导，实则求神问卜，吉凶难料。电影剧本有‘枪毙’之名，正是这时的事情。”<sup>2</sup>

《当代中国电影》的作者，后来的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认为：“它的目的是通过各有关方面的协调合作，使全国的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得到统一的思想指导，以避免出现政治上的失误。但在实际工作中，它根本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无论善良的还是苛刻的，都使得创作人员陷入无所适从和无法摆脱的茧缚之中，结果严重地甚至粗暴地干扰了创作。电影指导委员会前后共召开过十几次会议，大至全国电影剧本的题材规划和

<sup>1</sup> 《在电影局1954年第三次制片厂厂长会议上的讲话》，文化部存档资料。

<sup>2</sup> 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起搏书》第15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

电影生产计划的审定，小至每一个剧本的修改方案，都由它做出具体规定和执行细则，甚至具体到了亲自规定一个剧本中的对话或字幕表的顺序，直接确定一个摄制组的创作计划等的程度。这种过于集中统一而又琐碎具体的领导方式，势必造成电影创作生产死气沉沉的局面，不仅不能达到加强思想领导的作用，反而由于控制得过严过死，使电影剧本的成活率很低。”<sup>1</sup>

不管是归罪于江青，还是归咎于工作方法，都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电影指导委员会是国家订货、组织生产的极端尝试。只要一体化的体制存在，中国电影就不可能摆脱束缚，电影就不可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因此，电影指导委员会虽然结束了活动，但是它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动摇，其精神遗产继续发挥着作用。

遗产之一是电影“武器论”。指导委员会以列宁的教导“电影掌握在人民手里，是最重要的‘艺术武器’”为指南，要求“全党全军必须学会培养与充分使用这一宣传工具。”<sup>2</sup>后来的电影主管部门同样以此为圭臬。这种观念从根本上歪曲了电影的性质。

遗产之二是创作思想。指导委员会的两大主张——“写重大题材”和拍“工农兵电影”——在这个委员会解散之后，没有也不可能实质性的改变。1956年大鸣大放期间，钟惦棐等人对“工农兵电影”这一提法的置疑，六十年代初理论界对题材的挑战，以及文革时期激进派对这两大主张的极端发挥，都可以看出指导委员会的潜在影响。

遗产之三是电影的管理。在指导委员会成立之前，有关部门虽然在题材上对国营厂也有要求，但并没有耳提面命的硬性规定，指导委员会是题材规划、选题计划的始作俑者。指导委员会解散后，这一套思路和办法被继承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剧本审查方面亦然。■

2005年元月

<sup>1</sup> 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第70—7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sup>2</sup> 《加强党对电影创作领导的决定》，文化部存档资料。

## 【江青研究】

## “蓝喷”不是“蓝苹”

## ——江青笔名考

韦陀

1976年底和1977年，内部印发了“供批判用”的“四人帮”资料集和《张春桥、江青三十年代黑文》。上海图书馆还编了一本《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张春桥、江青三十年代资料索引》。这个索引列出了江青的十几个化名、笔名：云鹤、青云、云古、李进……，其中最著名的是“蓝苹”，最令人怀疑的是“蓝喷”。

“蓝喷”一名之令人怀疑，不在于它的怪诞。用“喷”字做名字的固然古今罕见，但没有理由不准江青突发奇想。何况编者还引用了1936年7月4日《大公报》上一位娱记乔琳写的《唐蓝珍闻》一文为证：“此文透露蓝苹曾署名蓝喷做文章《南行车中》。”

查《大公报》，乔琳是这样写的：蓝苹“时常有稿子在报上发表。”“她到济南去的前后几天，还有好几篇稿子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南行车中》、《农村演剧杂写》是其中的两篇。”而这两篇文章前者署名蓝喷，后者署名蓝苹。

那么，蓝喷是不是江青？让我们看一看蓝喷的作品。

从文体上讲，蓝喷的27篇文章都属于纪实散文。从人称上讲，这些文章分两类，14篇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写亲身经历或所思所感，13篇是以第三人称“他/她”来写下层人的生活 and 市井百态。

在以“我”为主角的文章中，除了两三篇之外，其它文章都很明显地告诉人们作者是个男性。《旧照》一文写道，某日，“我”整理旧书，在《少年维特之烦恼》里发现了一张“旧得将变黄的姑娘照片”，“我”想起了照片的来历：毕业典礼之后，这位姑娘丢给我一张照片，“我想把这照片天天放在口袋里，恐怕弄皱了，想放在匣子里或皮夹里，可是没有好看的匣子，又没有皮夹，后来总之我夹在这本书里了。把最爱的人的照片，放在最爱的书本里头，恐怕是最合理

的事情了罢？”显而易见，这姑娘是作者的初恋。

《公墓之夕》写作者为“箫”扫墓：“我颓丧地坐在箫的墓上，抚摸着墓上的青草，抚摸着灰色的碑碣，似乎又同箫在一起了！她那晚霞似的脸庞，充满着灵感和活力的眼睛，可爱的手似乎又在轻轻地击我肩头，真挚的说：‘蓝，向前去吧！’”很显然，箫生前是作者的女友。

《小轮船上》中的“我”乘坐的小轮船，夜里遭到土匪的打劫。听到枪响，船中富有的太太和小姐们急忙摘下首饰，藏到胸前；大肚子商人赶紧把钞票掖到鞋子里去。土匪提着枪跳上船，挨个搜身。拧着摸着“小姐少奶奶们珍贵的胸口，里面找出了珠镯或者金戒，便大笑着拿去了，搜不到东西也要她们的皮旗袍或者大衣，临走时还要拧一把奶子或摸一摸大腿”。而当劫匪跟“我”要钱的时候，“我”一边说没钱，一边站起身来，“把破大衣二边拉开”，“同时我的几本旧西书和手杖一起落在地上。喀啦一响，把土匪吓得一跳。”这些动作告诉我们，“我”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男子，一个懂得外文的穷读书人。

在《忧郁的调子》和《我做了肉票了》两文中，作者描述了自己的家庭身世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我”出身于一个大家族，有很多书。“我”从小嗜读书，“我”虽说是四房生的，地位低微，但似乎没受过穷。有一盲艺人，每晚在茶馆里说书。“我”每天积下二三个铜板去听说书，最爱听的就是《封神演义》。

这个“我”还打杀过人。“我”少年时，某晚被绑了“肉票”，关在一小屋。看押“我”的是一个瘦老头，一个月间，“我”被迫写了七八封勒索信，要家里交二千元来赎票。但家里一时拿不出来。瘦老头急了，声称三天之内不交钱就扯票。于是“我”决定“打出一条最后的生路来。”“黑夜又到了，我高提着板凳候在房门口，老人照例地托着菜和饭开进门来，我使用尽全身力气，猛地把板凳击在老人天门上！老人一声啊呀……还没喊完，连饭带菜汤都倒在地上了……我在老人床边找到了钥匙，开了大门，在黑暗中向不黑暗的处所奔，奔，象狂犬一样。”“我”逃回家才知道，绑匪就是二叔的佃户，那个“匪窟”就离“我家”六里地。

晚上到茶馆听说书，最爱听封神。用板凳打倒看押者……这类情事恐怕不是女性能做到的，何况在这两篇文章里，“我”被称为“少爷”。而在《枫泾布》、《在轮埠上》、《粉笔字》、《雨天的旅行》等文中，“我”被称为“先生”。

这位“少爷”、“先生”的老家在哪里呢？《松江之鲈》一文中，做了这样的

表述：“幸运的我做着个松江人，有的四鳃鲈吃。然而，这七、八年在奔波，四鳃鲈的鲜味，只在回忆里偷尝罢了。”松江在上海西南，以前叫松江县，古称华亭。四鳃鲈是那里的特产。在此文中，“我”介绍这种鱼的做法，说做鱼时最忌放酱油，一旦加了酱油，那鱼“就成了掉在秀野桥里的狗屎”。秀野桥是明洪武年间修的一座石拱桥，是松江的标志性建筑。

如果蓝喷真是江青的化名，那么，江青有什么必要以男性的身份写文章？她怎么可能以男性的眼光看待事物而不露破绽？作为一个木匠家庭出身，成年后在戏剧电影圈里讨生活的人，又从哪里获得上述生活的细节和感受？

在蓝喷的第三人称的文章中，有游记，有随笔，有小说，作者同情下层人的生活，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观察细致，描情状物不乏清新之笔。且文字之间，常有感慨议论，或讥讽众生，或冷嘲世相。

《香市小景》、《佘山行》和《佘山之行》是游记。“香市”指的是河南方城县的庙会，作者夜里乘船路过此地，“眼着许多海蛮子有意去拧路过的妇人的腰、手臂，大家有意推来推去，把丑得象水牛头一般的脸嘴，搁到女人肩上去……”

“佘山”指的是位于上海西南的松江区的佘山。作者两次到此处远足，“一路遇到的大半是头上兜着花布的网船娘，……晚霞色的脸上，飘忽着原始的笑意。”

“赭褐的断壁上，工人们吊在麻索上用铁铲和山石拼命，丁丁之声颤抖地传来，似乎诉说着他们的未来的命运。”

《登记》、《新谷》、《小猪的市场》、《渔汛》、《施医局》、《某晨纪事》、《秋夜》写的是草根民众的苦难：国民政府在农村搞土地普查，在痘神庙进行土地登记。农户张金生本有祖传的二亩地，登记者非说他的地只有一亩四分五。要重新丈量，每亩两块大洋。交不出钱的金生，“像只受伤的野狗，叹着气出来。”（《登记》）打谷场上，才根夫妇一边干活一边算计着，有了这三石稻子年夜下就能买下两个腊猪腌腌，还能给五岁的六宝买新米团子。正在这时，恒记仓的外账和当地的保正带人来了，装走了所有的稻谷。（《新谷》）木生不顾母亲和妻子的劝阻，到集市上去卖小猪。恒丰花米行的小老板闻讯赶来，向木生催索欠债，木生正欲分辩，小老板三拳两脚把木生打翻在乱柴堆里，直接把卖小猪钱收了去。（《小猪的市场》）顺雨领着十几个渔民驾着木船在渤海湾捕鱼，已经四天了，只打上了很少的鱼。这天夜里，“咯咯咯”的黄鱼的叫声让顺雨们兴奋异常，大家赶紧下网。

可就在收网之际，一艘黑色大轮船鸣着汽笛冲过来。木船赶紧扯篷帆，“船被风向左一幌，恰好撞在大轮船的高高的铁船头。哭声……叫唤……汽笛叫……黑暗……浪头卷去了人和船。”（《渔汛》）……

在这类文章中，《生路》一文最长，其描情状物可代表作者的最高水平。文章写一个叫“贼三多”的偷儿，从小孤孀的菜地里偷拔了莴苣笋和葱梗，小孤孀发现了，“嘴里飞着白沫，像敲破金锣似地骂着：贼骨头，绝子绝孙。”一边“像螃蟹一般走来”。贼三多“眨着烂眼睛，拉开嘴笑着”回应：“大阿嫂怕绝子孙，我来替传种好了！”“说完就跑，只拣小堤岸小竹林奔，奔过小弄堂，奔过坍石桥，疯狂得象剪去睫毛的牛似的走回痘神庙，钻进痘神老爷停着阴船的隔壁一间，开始用蚌壳刨去莴苣笋的皮。”然后，他就蹲在痘神庙前面的板桥上招呼买主。莴苣笋卖了五百五十文，这些铜钱装在贼三多的衣袋里，他每“走一步，便响一响，好象犯人的镣铐似的。”贼三多到一家团子店吃了肉馅汤团，剩下的钱“必得去抽二筒才过瘾……在烟馆的烟铺上，贼三多喷着三百三十文的烟，有蓝的，有白的，有一卷一卷的，有一丝一丝的，也好像依着拐杖的老寿星腾空而去的。……在这神秘的世界中，三多寻得了人生的真意义。”正当他抽得起劲，两个警察来了，不由分说，“充军似的提着贼三多，向警察局行进。”最后，贼三多以“屡犯窃案藐视法纪私吸洋烟弱种丧生”的罪名“由镇上的警察局解进城里的公安局，公安局备文解地方法院，法院三言两语一审之后，判令发落看守所先行戒烟，然后再入大禁，吃一年六个月的官司。”在局子里，三多因交不上香烟钱，“半夜过后遭吊打，用细麻绳吊住大拇指和大脚趾，抽一抽，打一打。”更要命的是，断了大烟，“眼泪鼻涕像开了坝，而且腰里的肋骨似乎在被人抽去了，一根一根的。”三多受不了了，决定用装死逃出去——他算计，看守所的棺材一定单薄，钉子也不会牢固。没想到，典狱官命令狱卒们牢牢地钉上棺盖，免得野狗把死人骨肉拖来拖去不卫生。于是狱卒们“击着筷样长的橄榄钉”卖力地钉棺材盖。三多着了急，在棺材里两脚乱蹬，狂喊救命。众人吓白了脸，典狱官可生了气，“混帐，诈死诈死。既要诈死就给他真死吧！”狱卒们蜂拥而上，钉盖子，拿绳子，寻杠子。三多在棺材里喊着救命，他的声气，“但似乎很远，很幽，好像物理室中试验音的传出时，罩在厚玻璃钟里的电铃一样微弱地呻吟着。”作者笔下的“贼三多”略有几分阿Q的气质，其笔调之阴冷似乎也在模仿鲁迅，文中那些新颖的比



喻，恐怕仅凭想象编不出来。

文学来自生活，如果蓝喷就是江青的话，那么，她从哪里来的这些生活？她曾在上海大夏大学旁听，在湖社、拓声演剧，在晨更工学团和女工夜校教女工们识字、唱歌和演戏。偶尔到农村演些活报剧，在被捕入狱获释后，到浙江临海的乡村养病，从1933年到1935年，她曾两次离沪（第一次在1934年初曾随黄敬，第二次在1935年初养好病去的）。1936年至1937年中叶的一年半的时候里，她除了去过济南，又从济南到过一次北京之外，一直在上海忙着演戏拍电影。也就是说，她没有机会去深入蓝喷所描写的生活，没有机会去观察和接触蓝喷笔下的那些人物。更没有机会频繁地外出，到蓝喷去过的痘神庙、渤海湾和方城县。

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假定江青有着非凡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在1936和1937年中旬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她也不可能以蓝苹之名，在《电通画报》、《上海大晚报》、《绸缪》等报刊发表10篇文字的同时，还要以“蓝喷”为笔名撰写了二十七篇文章。

蓝喷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上，最早出现在1936年3月16日，从那时到1937年3月20日，一年的时间里，蓝喷的名字始终没有离开这家报纸。除了1936年7月是空白之外，蓝喷平均每个月发表两篇文章。

在这期间，江青在干什么呢？她正在忙着演戏、恋爱、革命、婚变、同居和出风头。她的情绪始终处在亢奋和郁闷这两极之间。请看下面的时间表：

1935年6月江青演出《娜拉》受到好评。此后她参加了《自由神》、《都市风光》的拍摄，饰演配角。9月，她与唐纳同居。据她在《一封公开信》中交代，从1936年3月到6月的时间里，她是在生病、吵架、结婚和养病中度过的。

在这三个月中，蓝喷发表了《小酒店》、《登记》、《香市小景》《佘山行》、《渤海之夜》、《施医局》等8篇文章。此时之江青，怎么可能有心思静下心来写文章？接下来的一个月，江青先是在济南演了三天话剧，然后到北京找黄敬。6月26日唐纳因江青负心自杀未遂。两天后，江青从北京回到济南，陪唐纳回沪。

在这一个月里，蓝喷一如既往地发表着他的文字——6月15日的《枫泾布》，写“我”从上海搭夜班轮船回乡。6月18日的《南行车中》，写“我”从济南上车，往南边去，邻座是来自于北平的爹孙二人。

很难想象，在演戏的紧张，北上的倥偬，与旧情人相见的亢奋中，还有闲情

逸志去关心卖枫泾布的老太婆，与死去了女儿的老人聊天，并把他们写进文章里。

从1936年7月到翌年3月，江青为事业而奔忙，先是出演《狼山喋血记》，然后与王莹争演《赛金花》。败北之后，转向《大雷雨》，出演卡嘉琳娜。同时，又投到蔡楚生门下，饰演《王老五》中的女主角。

这期间，她的私生活更是精彩纷呈，与唐纳始而吵架，继而分居，分居后还要吵架，甚至天没亮就跑到朋友家去寻找仲裁。有一次还上演了“全武行”：二人在屋子里互殴。江青说当时的精神状态：“我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中，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而她的身体也出了毛病。由于“白天演《大雷雨》，同时夜里拍《王老五》。使我的身体坏到极点，尤其是心脏衰弱的更厉害。……我又病了。”（《一封公开信》）这并不妨碍她移情别恋——她与《大雷雨》的导演章泯同居了。

在这八个月里，蓝喷默默地笔耕。八月发表了《公墓之夕》、《我做了肉票》。九月发表了《在轮埠上》、《旧照》、《生路》等五文。其中的《生路》在《时事新报》上连载六天。从是年10月到次年3月，蓝喷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10篇文章。

1936年7月11日，《娱乐周报》发表了江青对近年生活的总结和反省：“自己在上海，度着跑跑舞场、吃吃咖啡的颓废生活，感到环境移人，意志消沉，所以离沪北去，参加救国运动的工作。”<sup>1</sup>

江青的反省是痛切的。但是，这与蓝喷无关——在蓝苹跑舞场的时候，蓝喷在小轮船上的辗转；在蓝苹吃咖啡的当儿，蓝喷想念着家乡的四鳃鲈；在蓝苹争角色、闹婚变的时候，蓝喷在爬格子。

至此，我们有足够的把握这样介绍蓝喷：男，1910年前后出生，籍贯江苏省松江县，出身地主，成分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懂外文，善写作。1935至1937年间常为报刊撰文……。

蓝喷与蓝苹，风马牛不相及。■

2012-2-17/27

<sup>1</sup> 叶永烈：《“四人帮”兴亡》，页113，北京，人民日报，2009。

## 【江青看片】

## 《瑞典女王》：好莱坞的异数

——江青崇拜的影星葛丽泰·嘉宝

瀑下

## 一、江青：我非常喜欢嘉宝

“我非常喜欢嘉宝。”这是1972年夏天，江青对史丹福大学副教授维特克女士说的。为什么呢？江青列出了三条理由：因为“她气质高贵，性格有一点叛逆，她的表演毫不做作，也不夸张，在19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sup>1</sup>

江青这一评价可谓知人。在好莱坞的女星中，嘉宝气质之高贵，无人可比。气质是天生的，与血统、遗传、贫富、贵贱无关。嘉宝出身贫寒，但这并不妨碍她气质超凡。即使是扮演香艳的角色，她也并不是靠性感、色相、美貌来吸引男人。如同柳如是一样，她吸引男性的，是独特的精神风采。这一风采隐现在她的眼神、举止和一颦一笑之中，无论男女都会为之倾倒。

她对世俗的叛逆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她终生不嫁，对好莱坞“伟大的情人”吉尔伯特的多次求婚毫不动心。1945年，她在世界影坛上正如日中天之际，她突然宣布息影。那时，她才36岁。在此后的45年中，她深居简出，远离媒体，逃避名利。柳如是常着儒服男装，她也喜欢穿着男服、戴着帽子散步。江青说她“有一点叛逆”，实在是客气。

至于嘉宝的表演，江青说她“在19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这不是过誉。嘉宝有四部电影：《安娜—克里斯蒂》、《罗曼史》、《茶花女》、《妮诺奇卡》获得奥斯卡提名，1954年，在她息影18年后，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授予她特别荣誉奖，表彰她的非凡贡献，称赞她的演技超群。

江青称赞嘉宝，是因为她的出身、性格和审美与嘉宝有类似之处。嘉宝出身于贫苦的工人家庭，她14岁时，父亲得了肾病，因无钱医治而逝。嘉宝上戏校时，总穿一件黑天鹅绒斗篷，为的是掩饰里面那些左缝右补的衣裙。江青虽然出身于小业主，但她的母亲是二房，江青很小的时候，其母就出去分过，日子从来不宽

<sup>1</sup> 李明三，〈江青 外媒眼中最有权势的中国女人〉，《凤凰周刊》，期3，2011年，页27。

裕。她上戏校的时候，“穷得连贴心的背心都买不起，常常空心穿旗袍。”<sup>1</sup>

江青从小就喜欢向秩序挑战，她六岁时，为抵制缠脚而战，成功地瞒过了母亲。五年级时，跟修身老师叫板，被学校开除。在戏校，男生都不敢在夜里进文庙，而她竟独自一人深更半夜地摘下了孔子像头上的“平天冠”。这种性格使她在上海时出尽了风头：演戏争角色，恋爱闹婚变。嘉宝只是在自己身上改变着世俗，她从来不曾伤害别人；江青则把这种改变扩展到了外部世界，为了满足自己，她从来不在乎伤害别人。

嘉宝的表演风格之所以得到江青的赞许，是因为，在她还叫蓝苹的时候，就养成了对“自然本色”的喜爱。她欣赏阮玲玉和王人美，因为她们自然。她讨厌陆丽霞，因为她扭捏做作。她演的娜拉，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她的表演被称为自然本色。<sup>2</sup>在她为“高大全”英雄的伪崇高操劳的时候，自然本色的审美趣味仍旧隐藏在她的内心某处。革命把她塑造成了一个优秀的两面派和杰出的实用主义者，使她能够在同一天里扮演两种完全对立的角色——在外面指导着既做作又夸张的无产阶级艺术，回到钓鱼台，就观赏资产阶级电影，沉浸于嘉宝的“不做作、不夸张”的表演艺术之中。

## 二、女王：我要培养和平的艺术

《瑞典女王》摄于1933年，嘉宝在片中饰演克莉斯汀女王。估计江青在上海时看过它，且印象深刻。否则她不会对嘉宝如此了解，并且在三十多年后，还向维特克夫人推崇这部电影。

故事从1632年讲起，那一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战死沙场，其女克莉斯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登基。14年后，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女王做了一件扭转了欧洲历史的大事。这是一场令人感动又催人反省的戏——

皇宫，女王坐在宝座上，略带疲倦地扫视了大殿里的“方阵”：议员、贵族、主教和农民代表。军乐奏响，查里亲王——女王的表兄，凯旋的英雄，军队的统帅，上身着皮甲，下身是紧身裤，足蹬带着马刺的皮靴，像运动员一样，迈着矫健而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后面是一队一身铠甲的士兵。

女王起身，欢迎亲王归来。亲王受宠若惊，挺直腰杆，抖动着小胡子，向女

<sup>1</sup> 王素萍：《她还不叫江青的时候》北京，十月文艺，1993，页93。

<sup>2</sup> 李成：《蓝苹访问记》1-4，《民报》，上海，1935年8月28、29、31日，9月1日。

王发出誓言：“敌人伤亡惨重，我军大获全胜，为了女王，为了祖国，我愿意重返沙场……”

大殿中，一片欢呼声。

枢密大臣，一位头秃齿豁的长者；贵族代表，一个瘦小枯干的绅士；大主教，一个须眉皆白的老翁；纷纷表态，请女王继承先王遗志，为了信仰，为了上帝，抓住时机，增派军队，将那些野蛮人斩尽杀绝。让他们向瑞典赔偿战争损失，赔得他们一分不剩……

查里亲王受到激励，又抖动起小胡子，要求女王批准他立即出征。

女王说话：“你们都表态了，可是，我想听听农夫怎么说，是他们冒着危险去打仗。”她把脸转向最边上的“方阵”，请前排的一位老伯说话。

那位老伯站了起来，小心地往前走了几步，两手堆在胸前：“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就打起来了。叫我们上战场，我们就去了。”

“你们再也不用去了！”女王的握起拳头，用力地挥舞了一下。“生活中还有比战争更重要的事。我受够了战争，我在摇篮里，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在打仗了。打够了。我要邀请各大国迅速而体面地议和。”

这一下可炸了窝——岂有此理，打了胜仗，反要议和？！议员、大臣、贵族、将军七嘴八舌，摆出各种理由试图说服女王，女王舌战群英——

主教：“那些异教徒已经在我们手心里，要让他们跪下求饶！”

女王：“大主教，难道要把不同信仰的人全部杀掉吗？你野心太大了！”

大臣：“如果敌人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呢？”

女王：“那就提出他们能够接受的条件。”

贵族：“您一定要为先王报仇！”

女王：“别提报仇了，要让先王得到公正的评价。”

将军：“我们的官兵不能白死，要让他们赔偿！”

女王皱眉，站起，扫视大殿，大呼小叫停止了，人们起立，看着女王。

“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我再也不想打仗了。战利品、荣誉、战旗和军号，这些发光的词藻的后面是什么呢？是死亡和毁灭。是成千上万的残废者。胜利的瑞典在被蹂躏的欧洲中像死海中的一个岛屿。告诉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百姓们得到安全与快乐，我要培养和平的艺术，生活的艺术！”

女王沙哑的嗓音在大殿中回荡。

### 三、顾彬：《狼图腾》让中国丢脸

瑞典王宫坐落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心地带，占地面积不大，就是加上它前后的马路，也不及一个太和殿。李泽厚说，西方的教堂、宫殿之所以往高了去，是因为人家心中有个上帝；中国的皇宫、庙宇之所以像摊煎饼似的向平面发展，是因为中国人不想从中“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sup>1</sup>换句话说，中国人只想着现世。

想着现世，是不是就更好斗，更尚武，更渴望大一统？我不知道。但是，在瑞典的经历使我得知，克莉斯汀女王的和平主义、人道精神是很难被国人接受的，即使他们移民到了这个北欧福地。

十几年前，我到隆德大学做客座，认识了若干移民当地的华人。这些人，无论是来自北京，还是来自天津、沈阳，无论毕业于清华，还是毕业于复旦，一提起“台独”来，个个衣袖奋襟，怒目切齿，大骂当朝“真他妈的窝囊”。

——“要叫我，早就派解放军过去，把他们全灭了。”

——“派什么军队呀，送他们一百枚远程导弹就解决问题。”

——“擒贼先擒王，先把李登辉、陈阿扁灭了！”

一位计算机女工程师的发言最惊人：“我儿子还小，要是再大点儿，我就送他去解放台湾！”

……

那黠武的劲头，一点也不亚于克莉斯汀座下的将军和大臣。我问他们：“你打了导弹之后，不派人去吗？人家跟你打游击，你能把宝岛变成焦土？把二千万台湾同胞全杀了吗？”

“你就眼看着他们分裂中国吗？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了！”这些归化瑞典的前中国人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前几年，出了一本畅销书《狼图腾》，好事者要为作者姜戎申请诺贝尔奖。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诺奖评委马悦然不理不睬，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话了：“这本书让中国丢脸。”“它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

<sup>1</sup>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中国社科，1984。页77。

记者请他解释。顾彬的说法让国人大吃一惊：“《狼图腾》的问题在于语言、形式、思维意识。它总是在重复纳粹主义式的‘血’、‘土地’、‘强者’之类的概念。如果书中的主张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并受到欢迎，那么这是中国人不光彩的一面。”浸泡在爱国主义中的中国文人不干了，他们纷纷在媒体上讨伐这位不知趣的老外。顾彬的话让人深省：“我从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长大的德国人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应该知道，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德国历史有着沉重、严肃的反省、深思和自我批判。我们对一些词非常敏感。比如说，纳粹分子主张的‘血’、‘土地’、‘强者’等。甚至‘民族’、‘国家’、‘爱国主义’等词至今仍很难被接受。”

顾彬的心与克莉斯汀女王是相通的。

#### 四、女王：我告诉你怎么打铁了吗？

国王也有人权问题。国王代表国家，所以，其人权又与主权、与国家、与民族难分难解。克莉斯汀爱上了西班牙特使，一位长着热烈多情的黑眼睛，蓄着小黑胡，富于异国情调的西班牙贵族。女王与他在雪地里邂逅，在旅店里重逢，特使那特有的诗人气质征服了这位打算做个“单身汉”的女王。

堂堂瑞典女王竟与小小的西班牙特使谈情说爱？是可忍，孰不可忍。上至贵族重臣，下至草民百姓，一致要求女王嫁给查里亲王，以保证王室血统的纯正。

重臣们开会，一致要求特使离开瑞典。“百姓的愿望”成了他们最好的借口。

女王怒了：“为什么？我过问过百姓的私生活吗？我命令他们该爱谁吗？我幸福了，就少为他们出力了吗？”

女王双手握拳，怒视着臣僚们：“还叫我统治者，这种称呼简直愚蠢得出奇！连我最个人的事都由别人说了算，这是什么统治者？我有我的自由，不能让国家剥夺。对你们不讲道理的强制，对宫廷中阴谋策划的强制，我绝不屈服！”

警卫司令跑进来报告：“皇宫外围满了百姓，他们来势汹汹，嚷着要见陛下。”

女王向大门走去。

警卫司令：“卫兵们已经准备好了，枪都装上了子弹，开枪吗？”

“不！”女王头也不回。

“那就把领头闹事的抓起来？”

“不!”女王斩钉截铁。

“那……”

“让他们进来!我不怕我的百姓。”女王昂首挺胸向外走。

大臣们怕出事,竭力劝阻,女王请他们闭嘴,谁也不许跟着。她一个人走出大殿,命令警卫司令:把卫兵们统统撤下,马上打开皇宫大门。

门开了,成百上千的百姓高举着火把,叫喊着,呼啸着,像一群疯子涌进大门,冲向王宫,跨上台阶。女王站在台阶上面的平台上,雕像一般,静静地注视着汹涌的人潮。百姓在距离女王七八级台阶的地方停住了。

女王摘下皮帽:“怎么?百姓们。这是善意的拜访吗?怎么没人说话?”

人群里发出吼声:“叫西班牙人滚回去!”

女王朝最前面的一个壮汉点头:“你,我的好百姓,过来。”

那汉子向前迈了两个台阶。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一个铁匠。”

“你是一个好铁匠吗?”

“是的,我的父亲就是铁匠,我父亲的父亲也是铁匠。”

“如果我到你的铁匠铺里,说我不喜欢你干的活儿。告诉你应该怎么打铁,怎么加料,行吗?”

铁匠无语。

女王:“我的事情是管理国家,我有办法管好它。你的事情是干好你的活儿,这都是祖传的。我的父亲就是国王,父亲的父亲也是国王。我的父亲为瑞典而死,我为瑞典而生。我的好百姓,回去干你们的事吧,我的事让我来做。”

铁匠如梦方醒,转过身,举起双臂高喊:女王万岁!

人群响应:女王万岁!女王万岁!

聚在一起的群众是最简单最愚蠢最情绪化,因此,也是最容易被挑动被改变的两脚动物。女王的几句话,顷刻之间改变了情势,疯子还是疯子,只不过从疯狂地反对西班牙特使,变成了疯狂地热爱自己的女王。

克莉斯汀,轻松又调皮地扬了扬眉毛,转身走回大殿,那些跟她的父亲同龄的将军、议员、贵族和大臣们还没回过味来,一场由暴民引起的排外主义的动乱



就这样结束了，实在让这些“爱国主义”者于心不甘——他们想假手于民，逼迫女王就范。

人权胜利了，国家让了步。但这只是假象。瑞典国财务大臣与西班牙特使决斗，特使伤重而亡，国家借助财政大臣的手，向人们证明，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幸福——哪怕你是一国之主。克莉斯汀女王的爱情之花刚刚开放就凋零了。发誓绝不屈服的女王，孤独地站在船边，茫然地看着大海——就像她无法战胜大海一样，她也无法征服命运。

## 五：江青：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

嘉宝是表演艺术家，江青是政治投机家。艺术家不懂政治，但有正义感，所以，嘉宝说，她要杀死希特勒。投机家懂得艺术，但不懂廉耻。所以，江青自封为“文艺旗手”。

这部影片唤起了江青什么情感，给予了她何种感受，我们无从知道，或许克莉斯汀的个性引起了她的共鸣，或许女王浪漫爱情让她的心动，或许权力的威力让她心仪，或许女王魅力令她倾倒……

但是所有的革命者都讲究实用，所有的激进派都是多面人，江青向维特克解释，嘉宝的影片之所以不宜公映，是因为公众会对它进行政治批判。而这对嘉宝不公平。<sup>1</sup>维特克夫人没有反问江青：为什么中国会有这种政治批判？是谁把这种思维方式注入到国人的思想之中？为什么只有她，才有权力观赏《瑞典女王》？

心理学说，心智不健全者有多种表现，没有内疚感是其一，没有自知之明是其二。这两条江青都占了，所以，她会理直气壮地为嘉宝抱不平：“为什么美国的金像奖不发给嘉宝？这简直不公平。”她会大言不惭地拜托维特克：“如果你回到美国，能见到嘉宝，请你把我的话转告她，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sup>2</sup>■

<sup>1</sup> 维特克：《红都女皇——江青同志》页434。

<sup>2</sup> 李明三：《江青外媒眼中最有权势的中国女人》，《凤凰周刊》，期3，2011年，页27。

## 【江青看片】

## 《红舞鞋》的诱惑

## ——江青最常看的电影

## 船六七

## 一、江青最欣赏的镜头

暮蔼沉沉，华屋静寂。昏黄的灯光中，莱蒙托夫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封辞职信，一个堆满了烟蒂的烟灰缸。他两只手交叉在胸前，两个大拇指不停地转动。镜头推进，在他的脸上定格：紧锁的眉宇，紧绷的嘴唇，恨怒交织的眼神……。他抓起那封信，站起，踱步，“啪啪”，他用力拍打着手中的信，自言自语：“蠢呀！”“蠢呀！”“真蠢呀！”——我们无从揣测，这个“蠢”指的是他自己，还是指剧团的台柱子——那个为了爱情而辞职的蓓蒂。

莱蒙托夫走到镜子面前，镜子里映照出一个英俊的中年男子的脸：棕色的眼睛，略带卷曲的浓密的黑发，标致的小胡子。他注视着镜子，嘴角掠过一丝嘲讽，突然，他呲牙裂嘴，一拳砸向了镜子。镜子裂了。拳头落下的地方，出现了一圈圈白色的裂纹，这些裂纹呈放射状扩散开去，使镜子里的人像残缺不全。

这是《红舞鞋》（又译为《红菱艳》）里面的一个镜头。

在江青欣赏的西片中，《红舞鞋》是她看的次数最多的一部。她的保健护士说她是“《红菱艳》看不厌，菠菜泥吃不厌”。她不仅从头到尾地看，还要挑其中的某个段落看。放映员因此对这部影片了如指掌。只要江青吩咐一声要看哪一段，几分钟之内它就会呈现在银幕之上。莱蒙托夫砸镜子的一场戏，是江青的最爱。

## 二、一个掉牙的老故事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芭蕾舞剧团的老板莱蒙托夫偏执地认为，要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就必须放弃爱情。他让蓓蒂担任《红舞鞋》的主角，蓓蒂一跳成名。正当莱蒙托夫决定让她在所有的舞剧中担任主角，全球巡演，从而将她培养成一

名伟大的舞蹈家的时候，她却与作曲家格拉斯跌入爱河。莱开除了格拉斯，蓓蒂愤而辞职。莱虽然重新启用另一女演员担纲。但他仍想让蓓蒂回剧团。一次，蓓蒂来到剧团所在的城市，莱用成名成家说服蓓蒂，蓓蒂答应再跳一场《红舞鞋》。这时，格拉斯赶来，要求蓓蒂放弃演出。莱斥责格拉斯耽误了蓓蒂的前程，并提醒她要遵守演出合同——台下的观众正在翘首以待。蓓蒂进退两难，格拉斯斥责她背叛了爱情，愤然离去。蓓蒂冲出剧院，追赶格拉斯，不幸在车站殒命。临终前，她让格拉斯脱下脚上的红舞鞋。

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的故事，早在古希腊就有了。“特洛伊之战”就是因此而引起的。

### 三、安徒生的“新教伦理”

说这个电影是根据安徒生的故事改编的，并不准确。安徒生虽然也讲了一双跳个没完没了的红鞋，讲了诱惑与惩罚，但他的主旨是要放弃物欲，摒弃虚华，勤劳节俭，忠于上帝，常思报恩。

小姑娘珈伦，在做圣礼、吃圣餐时心不在焉，老想着她那双漂亮的红鞋。是对上帝不忠。她不去照顾生病的养母，而去参加舞会以炫耀那双鞋子，是失掉了报恩之心。那位留着奇怪的长胡子，拄着拐杖的老兵是撒旦派来的魔鬼，他出没在教堂门口，不断地称赞珈伦的红鞋多么漂亮，是在诱惑珈伦，当珈伦迷上红鞋，他就向鞋施以魔法，让它自动跳舞，而且牢牢地长在了珈伦的脚上。

上帝对她的惩罚是残忍的——快被累死的珈伦，不得不请求刽子手砍掉她的双脚。而那双穿在血淋淋的双脚上的红鞋，还是在她的眼前大跳特跳，恐吓她不许去教堂。

上帝对救赎的吁求是冷酷的——即使在她虔诚地忏悔之后，那位庄严沉着，手持长剑，身穿白长袍，煽动着翅膀的安琪儿也不肯援手，坚持要把惩罚进行到底——她乞求牧师收留，拖着残疾之身为他家干这干那。只有到了晚上，在牧师念圣诗的时候，她才有机会聆听。为了表示自己的忏悔之诚，每当牧师的家人谈论衣服之美，排场之华的时候，她就摇头。礼拜天，当牧师一家去教堂去听上帝的训诫的时候。她满眼泪水，凄惨地看着她的拐杖，不敢同往，而只能躲在自己的小屋里手捧圣诗集，以至诚至敬之心，诵读里面的字句。教堂的琴声随风而至，

她以泪洗面，吁求主的帮助。

只有在这时，上帝才显出一丝慈悲——安琪儿出现了，她把那个失足的残疾姑娘带到了教堂。珈伦得到了宽恕。琴声优雅，歌声美妙，朗日晴空，巨大的幸福充盈其胸，使她无法承受。她的心爆裂了，她的灵魂飞进了天国。

这篇故事源于安徒生对儿时生活的回忆：受坚礼那天，他穿了一双新靴子，每走一步，靴子都咯吱作响，起初他为引起众人的关注而得意，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对上帝的大不敬。

这个故事表述了基督徒的人生观：勤劳、俭朴、克己。故事中的红鞋是虚荣和物欲的化身，砍掉双足代表着用肉体的痛苦来赎回物欲之罪，而不计报酬的劳作、摒弃物欲和享受才是人生的康庄大道。这正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的“入世的禁欲主义”。

或许，可以说《红舞鞋》对安徒生的故事做了创造性的转换，在这里，艺术成了上帝，爱情成了诱惑人的物欲，莱蒙托夫成了上帝的使者——那个严厉的，不通人情的安琪儿，格拉斯则成了魔鬼——那个留着长胡子的老兵，他用男欢女爱来诱惑蓓蒂。

#### 四、莱蒙托夫：一个“迷人的魔鬼”

这是伯爵夫人对莱蒙托夫的评价。他为什么成了“魔鬼”呢？因为他清高简傲，刻薄无情——为了给侄女创造进入莱蒙托夫芭蕾舞剧团的机会，伯爵夫人举办了大型的晚宴。费尽心机把这位名满四海的剧团老总请来。可是，他对这位高贵的女主人，一点也不给面子。

伯爵夫人对莱蒙托夫说，她为他准备了一点意外的享受。

莱反唇相讥：“是享受还是难受？”

伯爵夫人不得不直言相告：“我想请你看看我的侄女跳芭蕾。这该是难受还是享受？”

莱更直截了当：“这是难受。”

贵族的标志之一，就是有教养。伯爵夫人尽管很下不来台，但仍然用微笑掩饰着尴尬。要是换上中国的新贵，恐怕莱总的脸上会挨上一拳。

莱问伯爵夫人什么是芭蕾，夫人说，芭蕾是一种动作的诗篇。莱告诉她：“远

不止如此，芭蕾是一种信仰。任何人不允许自己的信仰在这种环境里表现出来。”

这个“魔鬼”的刻薄还远不止于此。

在巴黎，剧团在排练，女主角依莉娜激动地向大家宣布：我要结婚了。大家上前祝贺，只有莱蒙托夫在一边冷冷地注视着。依莉娜想请莱蒙托夫说一句祝福的话，莱转身走掉。“太没心肝了。”这是依莉娜对莱的评价。

剧团离开巴黎时，依莉娜到车站与朋友们告别。莱蒙托夫走来，依莉娜迎上去，莱冷冷地叫了她一声。依莉娜受宠若惊，含情脉脉地闭上眼睛，上身前倾，等着莱的吻别。莱再次转身离去。依睁开眼睛，伤心欲绝。

如果说，莱对伯爵夫人的冷漠，是为了维护芭蕾舞的高贵和纯洁，使之不受世俗的污染。那么，他对依莉娜的冷漠，则是出于一种牢不可破的偏见——结婚是艺术坟墓。他跟丑角留伯夫说得清楚：“沉湎于爱的空虚情趣的人，绝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舞蹈家。永远不会！”

那么，这个魔鬼何以迷人呢？

首先，他是艺术大师。他精通芭蕾舞的所有艺术，从音乐、舞蹈、服装到舞台设计。他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只凭一支短短的曲子，他就聘用了还在大学读书的格拉斯来剧团作曲，他把一个普通的芭蕾舞演员蓓蒂，培养成了大红大紫的明星。

其次，他是企业家，更是事业家。他不但知道如何经营，如何提高剧团的知名度。还把剧团当作培养艺术家的摇篮，把自己视为艺术的守护神。他的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培养芭蕾舞大师。

再次，他精通人情世故，当格拉斯冲进他的办公室，控告《火之星》舞曲的作者帕沃教授，剽窃了他的作品时，莱蒙托夫劝告这位激动的年轻人：“马上把信销毁，把这事全忘了，这些事往往是无意中发生的，值得记住的是，失窃者固然不幸，但是剽窃者更为可悲。”

迷人，对于异性来说，恐怕还包括他对美色与情欲的绝决态度——作为剧团老总，他年年月月天天处在美女、才女的包围之中，所有的女人都在向他献殷勤，都渴望得到他的爱抚。然而，人到中年，他仍不为美色所动。

蓓蒂说他是“有才华的残暴的恶魔。”这其中未必没有醋意。

## 五、江青的“自我实现”

每人都有欲望，都会被诱惑。最普遍、最要命的诱惑是掌声、鲜花、赞美和万人拥戴。这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听惯了“万岁”“乌拉”的人们，总是希望有更多的掌声，更多的“乌拉”。阿谀迎合之辈从来不曾缺少，于是，敬爱，就会变成最敬爱，最最最敬爱，最最最最敬爱……。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顶峰也不过如此吧？可惜，“自我实现”是受道德原则支配的，它至少可以分为利己利人、利己损人、利己但不损人三种。

江青说，她看西片是为了学习人家的技术，这部穿插了大量芭蕾舞的影片，是否对她指导中国的芭蕾舞片有帮助，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只是，她曾经一遍又一遍地看这部电影。

从1963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之时，中国的撒旦就让江青穿上了“红舞鞋”，在权力的诱惑下，她大跳特跳，从京剧改革到样板戏，从中央文革到“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双红舞鞋让她跳了十几年，直到跳进了秦城。聪明的江青直到投环自尽，也没有悟出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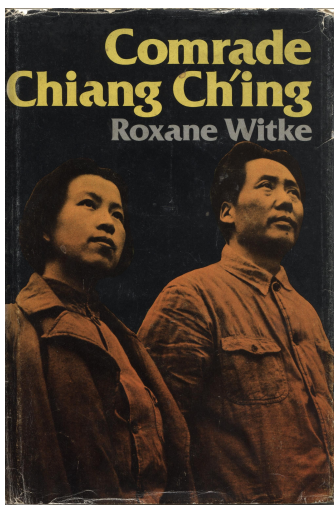
## 【评论】

编者按：近年来，先后有四位学者（大学教师、在校博士生）致信本刊，询问如何评价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写的《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一书。他们之所以提出这问题，是因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某院士对此书的评价。这位院士认为，“Roxane Witke（罗克珊·维特克）由于对江青的自吹自擂不加检证和核实而照单全收，引起学界的普遍挞伐和谴责。该书甫出版便成了学术垃圾。我在七十年代末期柏克莱的新书店以约十分一的价钱（三块多美元）便买到了一本全新的精装本。江青的自我吹嘘和胡说八道未经审核便收入 Roxane Witke 的书中。”该学者还对此书的中译本提出批评：“尤其不能用范思译的《红都女皇——江青同志》，因为，译者为了攻击江青，竟把原书中许多中性用语改为贬斥字眼，因而离原意更远。”为了回答这些读者的提出的问题，本刊邀请了余汝信、沈迈克和阎长贵三位学者，对此问题发表意见。并重发旅美文革史学家丁凯文先生2008年发表的《也谈维特克访华和江青》一文（本刊第64期），以及另一位文革史学家余汝信先生2004年就此书撰写的开创性文章。

## 关于维特克的《江青同志》

## ——兼答台湾某学者

余汝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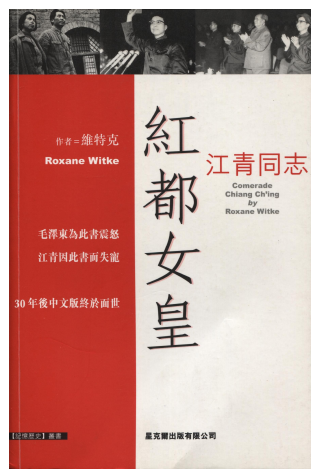
《江青同志》当然算得上是后人研究江青生平和思想的一本极重要的参考读本。严格地说，罗克珊·维特克虽然是一位不错的中国问题专家，但《江青同志》并非是一本研究江青的专著而是由维特克整理的江青关于其一生经历的口述记录。所以，不能也不必要求此书对江青的所有说话（包括所谓“自吹自擂”）加以评论、验证和核实，只要此书所记录的是1970年代初江青的真实思想就足够了。以口述

史的标准衡量，此书还原一个本来面目的江青、“精确地转达她所说的话”（维特克语）的目的，基本上是达到了。

在维特克之前及之后，从来没有人能有与江青对话六十小时并详加记录的“荣幸”。这就保证了《江青同志》的主要素材来源是独特的、第一手的。根据维特克在该书“序言”中的说法，该书是在江青表达了出版愿望的情况下得到“授权”的。在北京的谈话，维特克未有记录，中方在两周后将经整理过的谈话记录副本交给了她。“如我所料，一些诋毁林彪的惊人话语及其对于她身心健康的伤害，从官方记录中删掉了，但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应她的要求，这些细节也没有出现在本书中。”而在广州的会晤中，维特克自己作了笔记。“包括她说的大部份话以及我对她的观察，她的言谈举止，行坐起卧，以及其他人的参与。”江青保证维特克会像第一次那样拿到一份记录副本，但此承诺一直没有兑现。所以，此书写作过程中绝大部分依靠的是维特克自己的笔记。而这样做反而有好处：“他们不交出江青谈话官方版本的决定，使我有出版这本书的自由。我可以写下她说的话，外界有关的评价，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解读，而不仅仅作为江青的传声筒。”

维特克毕竟是一位仅粗通中文的外国人，因此，在记录和解读江青的谈话时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错讹或不到位之处。如第十五节“林彪弄巧成拙”中，江青“回忆1970年对北京中山公园碧云寺令人紧张的访问”，“因为她所钦佩的负责文化事务的吴德（彭真被罢免后任北京代理市长）有其他事情，她便由王力（1967年被指控属于516兵团）陪同。王力是个笨蛋，她厌恶地回忆说，那天表现得很不谦虚。”碧云寺应在香山而非中山公园，王力既然1967年已倒台且还在囚禁中，怎么会在1970年出现陪同江青？幸好，类似这样明显的错误全书并不多见。

顺便说一句，《江青同志》原著英文版1977年面世。加上俗气的“红都女皇”书名的中译本2006年由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译本并未得到原著作者的授权，印了一版在维特克提出异议后停止发行。中译本定价港币120元，由于印数稀少，现已一书难求。■





【评论】

## 我看《江青同志》一书

### ——关于余汝信对此书的评价

阎长贵

余汝信这篇短文写得很好，我完全同意。文章虽短，论述和分析都十分精到。我做不到。2006年10月，我读《江青同志》这本书时，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既不盲目吹捧，也不蓄意贬低”，是“严肃而又立场超然的”（括号中为中文译者的话），但有一些史实错误。我还写道：“她没把江青妖魔化，也没美化。应当说，是客观的、公正的。”■

2012年4月29日

【评论】

## 《江青同志》与“引文学”

(瑞典) 沈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

这位台湾学者谈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分两部分，其一为“引文学”的问题，其二为“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问题。先说后面这个问题：《江青同志》一书原来是商业性出版物，而不是学术性出版社出的。在欧美，尤其是这一类出版物上市若干年之后，难免以减价货的形式遭到“清理”，这是属于“清仓”一类的市场常规事情（学术出版界也经常能见到的）。这在市场经济里恐怕有点避免不了，我认为绝对不能光从这个角度看“垃圾”和“非垃圾”的问题，以为书一旦减了价，说明其学术价值本来就不高了。

我愿意拿出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 Lewis Siegelbaum 和 Andrei

Sokolov 合编的《Stalinism as a Way of Life》（《当作生活方式的斯大林主义》）的书，是一本非常好的厚厚的精装巨著，学术研究价值很高，结果我的这一本是在上市后第二年在伦敦专门的减价书店里花了大约一镑钱买到手的。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那就是十年前北京出的一本奇书《中西风马牛》，隆德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和教师都普遍认为这本书的价值非常高，是一份研究欧洲和中国两地之间在改革开放后期的民间来往、高教界交流的珍贵历史资料，但据我了解该书在中国上市以后，没过几年就以三折、二折的价钱被处理了，这绝对不能说明此书已经由精神食料变成“垃圾”了！所以，我的意思是《江青同志》学术价值的高低是我们这些人说了算，而不是书商。

第二个问题就是属于“引文学”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写一篇很长很长的专门文章来探讨。我还记得当年买到的《江青同志》这本书以后，我很失望，因为看不出来其中所讲的一些事情到底是作者亲耳从江青那里听到的呢，还是回到美国以后从其他（即“二手”）材料那里补充上去的事情呢？正好因为我看不出来书里的 voice（话）是谁的，是 Witke 还是江在说话，所以我自己有点不敢用这本书做历史依据讲文革中的人和事，后来我干脆把它送给大学图书馆了。

但是，像那位中华台北的大腕那样，硬说此书是“江青的自吹自擂不加检证和核实便照单全收”，恐怕总有点太过分了，太“政治”了吧！比方说，你要研究江青本人，那么这本书一定得看，一定得参考，要不你就是傻瓜。不能“全盘否定”嘛！至于怎么用，怎么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说《江青同志》当年“引起学界的普遍挞伐和谴责”好像是不对的，我起码记得对此书当年学术界里有褒有贬，不能说“此书刚一出版便成了学术垃圾”。至于拿某学者引用了（或在注释里提到了）一本书来说明此书有无价值，这恐怕也不是办法，是对学术研究本身的一种误解。我原来不愿意在《毛最后的革命》里提到张某的书，认为此书竟胡说八道，我们提到它等于是抬举它，但我的合著者另有高见，认为提还是要提的，一次就够了，提的时候要加注释说明我们怀疑书的可靠性，我说那也行，由我来办吧（参见台湾版《毛最后的革命》第二章，注释#73）。反正引用或列为参考文献并非“肯定”一本书的意思！■

2012年4月24日

【文摘】

## 也谈维特克访华与江青

丁凯文

美国学者罗克姗·维特克女士（Roxane Witke）1972年夏访华并见到江青一事，在文革当中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由于当事人江青在1976年10月被打倒，在1977年揭批“四人帮”反党罪行时，江青曾于1972年8月会见维特克女士一事也被渲染成“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在1977年的中发[1977]3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里，江青被指责为“抗拒周总理的指示，私自同维特克谈话七次，长达六十小时。她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肆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她大量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奉送重要军事地图和机密资料，里通外国，卖国求名。”

作为历史学者的维特克女士，因对江青的访谈，无端卷入这场中共自己的党内斗争，遭遇池鱼之殃。日后更由于坊间所传言的《红都女皇》一书，维特克本人被张冠李戴，成为传言之中心人物。“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一幅漫画中，江青被描绘成用“党和国家的机密”无耻地换取维特克赐予的“红都女皇”的桂冠。近几年来已有文革史家余汝信撰写两篇文章深入探讨这一事件。<sup>1</sup>然而，国内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章鲜少对维特克女士做客观、公正的评论。有感于此，笔者愿（上图：当年的一幅漫画）就此事谈些个人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 一、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文件等对维特克的评论

<sup>1</sup> 余汝信《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见枫华园电子杂志第448期，2004年4月30日，还见“林彪·军队·文革”网站，“余汝信文集”；余汝信《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见《记忆》电子杂志第6期，2008年10月30日，还见《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677期，2008年11月18日。

笔者见到的中共领导人讲话中最早谈及维特克访华一事的是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也就是华国锋主导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华国锋在接见山东、湖北、江苏、上海和南京、济南、武汉部队的领导人时发表了讲话。华国锋在讲话中称：“美国记者维特克，是情报局的，江青和她谈话，把中央很多东西传出去，讲了很多下流的话，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污蔑。”<sup>1</sup>

1976年10月12日接见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等人时，华国锋又说：“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sup>2</sup>华国锋的这次谈话不再称维特克女士“是情报局”的，将这顶“特务”帽子从维特克头上摘了下来，尽管称维特克是“作家”，仍然不能算准确。这里华国锋所言的“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看来并未成功实施，但仍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为了坐实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中共中央在1977年9月23日下发了3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文件中罗列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新华社揭发姚文元利用职权掩盖江青里通外国的罪行”和“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的揭发交代”。其中“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最具爆炸性：“江青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认为这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大好机会，无视周总理批示，在北京一次就见了六个小时。”“周总理指出：维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要江青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大发雷霆，叫嚷：‘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她一意孤行，又同维谈了六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六十小时。”“江青为了掩盖她里通外国的罪行，伙同王洪文强令收缴有关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材料，销毁罪证。”

事实上，维特克女士是得到中国方面的邀请访华而见到一些中国妇女界领导人，如邓颖超、康克清，经过周恩来的批准与安排乃至最终见到江青，未知何以周恩来称维特克“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张清化的揭

<sup>1</sup>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版。

<sup>2</sup>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发则称，江青“谈完后，当场即将《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和《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重要图表，拱手送给了维特克。”“以上图表的内容大部份是我们没有公开的。江青里通外国，出卖了大量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此后国内出版的相关回忆录，如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张颖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负责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邬吉成、王凡的《红色警卫》等书对此大都口径一致，沿袭了中共中央的定论。比如，《红色警卫》一书说：“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她（指江青）竟然置组织纪律于不顾，泄露了大量党内的机密。她把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告诉维特克，还把一些机密的作战地图和照片，送给维特克。”<sup>1</sup>大陆作家叶永烈说得更直白：“她（指维特克）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sup>2</sup>

以上情况表明，中共中央高层虽然未必认定维特克女士真的负有某种特殊使命，但是由于江青是被打倒的“反党、反革命集团”首犯，因此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也要上纲上线，冠以“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的大帽子。而维特克本人则被动地成为江青“里通外国”和接受中国“国家机密”的承受人。也许这就是为何中央文件要借周恩来之口说“维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可笑的是，既然周恩来认为维特克“来历又未弄清”，何以当初主动建议江青与其会见呢？而大陆的作家们，仅仅因为维特克与江青的几次谈话被中共中央点名，就将其纳入“另类”，事事都要从反面加以诠释，不亦悲乎？

## 二、维特克女士对中国的研究

维特克女士本科就读于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维特克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现代中国在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of Modern China*）。值得一提的是，维特克就读的这三所学校

<sup>1</sup> 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

<sup>2</sup> 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下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1116—1117页。

都是美国顶尖的大学，在学术上均享有盛誉。此后维特克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学术机构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如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等。维特克的研究范围着重于近代革命的中国和当代中国社会，也为美国国务院就中国事务提供咨询，并参与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会。维特克女士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以及《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发表多篇文章。例如，维特克在1967年《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妇女与自杀》(*Mao Tse-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1979年2月维特克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文化革命之后的中国》(*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维特克女士专注于中国妇女的专题研究，与 Robert Riden 合作著有《红旗飘飘：“红旗飘飘”文集指南》(*The Red Flag Waves: A Guide to the Hung-chi piao piao Collection*)，1968年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与 Margery Wolf 合编《中国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Chinese Society*)，1975年12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维特克在访问中国前是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历史系的副教授。

这里顺带一提的是，大陆作家叶永烈否认维特克是副教授，叶说：“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sup>1</sup>这是叶永烈对美国学校教职缺乏了解之故。美国大学的教职分三级：“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和教授(professor)。拿到副教授相当于有了终身教职，学校如非有特殊原因不能随意解聘。而维特克当时就是该校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从以上搜集到的不完全资料来看，维特克是长期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严肃、严谨的美国学者。正是由于对中国现代历史和妇女问题的研究，维特克期望亲自走访中国，实地观察、了解乃至访问中国和中国妇女领导人，这就是维特克1972年访华的初衷。维特克在纽约通过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交往，获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在1972年夏“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对外友协则承担维特克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sup>2</sup>

### 三、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

<sup>1</sup> 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下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1113页。

<sup>2</sup> 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R.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19页。

综合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和维特克本人所著《江青同志》一书，兹将维特克与江青谈话的大致经过罗列如下：

(1) 维特克到中国后向负责接待的对外友协提出希望采访的人员名单，包括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在与一些历史学家、医生和艺术家的访谈之后，维特克见到了邓颖超和康克清这两位中国妇女界的元老。中国对外友协还向周恩来呈报了维特克希望见到江青的请求，周恩来在对外友协的呈文上作了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sup>1</sup>江青看到邓颖超、康克清会见维特克的简报，又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说：“一位政治家如果想在国内有牢固的政治地位，没有国际舆论的支持是不行的。”江青提出要见维特克，并请周恩来负责安排接见事宜。<sup>2</sup>

杨银禄认为“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和会见，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她（指维特克）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便提出了会见江青的要求。”<sup>3</sup>杨银禄此言对维特克颇有贬义，显然有失公允。维特克作为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学者，受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访华，当然期望认识、了解更多的中国妇女界领导人，包括江青在内。但是江青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不容易见到，期望得到江青接见应属奢求，维特克自己开始也不抱过高的期望。维特克回忆说：“下榻北京饭店后不久，我被要求起草一份旅行计划，提交一份我想采访的人的名单。旅行计划比较简单，列出一些主要的景点和城市，而我列出的采访对象有预期可以见得到的和一些看起来不可能见到的人，其中也包括本书的主人公，那不过是出于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和革命文化的权威形式上的敬意。那时我没有抱任何希望，而且因为她令人生畏的声望，我也没有指望要见到她。”<sup>4</sup>安排江青会见维特克是周恩来主动为之。杨银禄揣测维特克求见江青的动机是“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纯属臆测，并无事实根据。叶永烈更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说：“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

<sup>1</sup>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sup>2</sup> 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见《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

<sup>3</sup> 同上。

<sup>4</sup>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第22页。

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sup>1</sup>不知叶永烈有何事实和证据证明维特克“所获甚少”，又有何证据证明维特克“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叶永烈将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贬斥为“一拍即合”纯属毫无道理的偏见。

(2) 张颖指称江青在谈话中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sup>2</sup>杨银禄的文章则与张颖的回忆大致雷同。其实，无论是张颖的回忆还是杨银禄的回忆，都是1977年下发的37号文件的翻版，该文件里的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揭发材料就称“江青与维一见面，就要维为她写传记。她对维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我谈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能走斯诺的道路’。”<sup>3</sup>众所周知，中共为了达到批倒批臭自己对手的政治目的，这类由中央下发的揭批材料的可信度和真实性都极低。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人们仍然不加分辨地予以引用，难免不被误导。

维特克书中则完全没有这一情节。维特克记述说：“她（指江青）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她说周总理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建议她应该接见哪些外国客人。当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维拉·斯诺1970年9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为她安排了一次接风，当时时间短促，江青正在家中小酌，即被召集参加。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到，她一时不知道应该送给尊贵的客人一份什么样的合适礼物。而在斯诺夫人这一边，也被搞得一团糟，结果意外地把本来准备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送给了江青！‘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道。虽然曾经读过很多斯诺写的书和文章，我没有见过他们，对于他的作品我们只聊了几句。然而，我和他的前妻尼姆·韦尔斯有联系，她曾经在1930年代末期采访过中国的女性革命领导人。

‘他现在的妻子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见到她，请转达我对她和她的家人的问候以及欢迎她再次来访。你成为中国的朋友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看看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接待你。’”<sup>4</sup>江青如果当场要求维特克为自己写书出传记，

<sup>1</sup> 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下卷，第1117—1118页。

<sup>2</sup>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24页。

<sup>3</sup>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

<sup>4</sup>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29页。



维特克应该不会遗漏。维特克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和中方提供的记录稿所撰，在1977年出版《江青同志》一书，据1972年不过仅仅4、5年而已，而张颖的回忆却是在25年之后的1997年问世。此外，笔者在2010年11月感恩节前后，设法联系上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维特克女士，向她求证这一情节。维特克向笔者证实江青在谈话中从未要求维特克为自己撰写一部传记。由此可见，张颖的回忆确有事后丑化、脸谱化江青之嫌。

(3) 江青主动安排在广州继续与维特克的谈话。在北京与江青谈话后，维特克又与邓颖超等其他妇女界领导人会谈了四天，在此期间，江青还不断派人带来江青的讲话、照片和一些艺术品。随后，维特克转去上海访问。维特克自己承认她并未期待能再次见到江青。8月24日维特克在上海访问时，突然被告知江青要在广州再次与她见面。<sup>1</sup>8月25日到8月31日，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进行了7天，每天谈一次，短则五六个小时，长则达八九个小时，加上第一次在北京的谈话，双方共谈了60多个小时。据张颖的回忆，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的主要内容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战争情况，江青意图说明她当时与毛泽东在一起，共同指挥了战斗；江青个人早年的革命经历和与毛泽东的婚姻，以及一些家庭情况；三十年代上海党组织与鲁迅相关的一些情况；中共建国后江青参与的一些文艺方面的工作，如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以及《红楼梦》评论等；建国后中共党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以及党内斗争；江青自己搞的文艺革命，其中涉及京剧、话剧、电影、音乐、舞蹈、体育等。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内容广泛，涉及面很多，但张颖认为江青的谈话“没有逻辑、胡编滥造”，江青的目的是“有计划地为自己树碑立传”，江青“有些话故意说得不清不楚，这就可以让维特克去编造去发挥。”<sup>2</sup>姑且不论江青的谈话是否“没有逻辑、胡编乱造”，笔者认为，江青虽然不是一个有条理有才华的叙事者，她的谈话往往有些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但是张颖由此而认为这是江青故意让维特克去编造历史写故事，显然只是一种个人的臆测，也未免低估了维特克作为历史学者的专业素养。

关于广州谈话的内容，维特克在书中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如江青在上海的经历，特别是涉及“左联”以及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等。维特克特别强调江青力图给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印象，维特克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sup>1</sup>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34—37页。

<sup>2</sup>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第99页。

她（指江青）建议把她的生活经历放在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当一个人把革命经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显得微不足道。”维特克说：“我们谈话的模式都是从傍晚开始，持续了六天，间或休息时用些晚餐，然后继续我们的谈话，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有一次，我们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和当天下午还各进行了一次额外的谈话。这样，江青以这种君临天下的帝王般的无产阶级特色进行谈话，她经常兴致所至漫无边际地讲述她的革命经历。”<sup>1</sup>

如上所述，维特克在书中没有只言片语涉及江青明确要求维特克为自己写书的内容，且维特克也对笔者亲口予以否认。杨银禄却说：“在为维特克夫人送行时，江青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sup>2</sup>但是另一个当事人张颖的详尽回忆却没有这个内容。很难想象，江青会这么迫不及待地明确要求维特克为自己树碑立传，而当事人维特克对此竟然不置一词，置若罔闻。看来杨银禄的回忆也难免流于党文化的窠臼。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西方世界常常用“铁幕”二字来形容共产国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仅仅是打破坚冰的开始，西方迫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国也有同样的要求。江青同意接见维特克，当然有自己的打算，希望通过维特克向国际世界展示自己的一切，树立一个个人的“光辉形象”。西方学者从其自身的立场出发，一定会在访谈后发表自己的看法或出版自己的专著，根本无需中方人士刻意地提示，那样反而会弄巧成拙。江青也不至于笨到这种程度低三下四地恳求一个初次见面的外国人为自己树碑立传。站在维特克的角度，维特克的中国之行能得到江青接见，显然出乎意料，原先有关中国妇女的研究计划无形中被“江青”这个特殊的课题所取代，这也属正常。所以，维特克回美后撰写一部有关江青的书籍是件毋庸置疑之事，至于怎样撰写与何时出版则是维特克自己的事情，无需外人置喙。反倒是大陆的一些作家戴着有色眼镜刻意曲解维特克访华事件，以配合官方批判江青“篡党夺权的野心”。

中方人士的回忆与著述之所以存在某些严重的问题，关键在于人物的脸谱化，以官方的是非为是非。江青作为文革中的政治人物，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解析、研究，而非事事丑化。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是周恩来从中牵线搭桥，无论双方谈几次，都不能看成是江青的错误，即使江青心中希望维特克回美后写一本关

<sup>1</sup>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 41—42 页。

<sup>2</sup> 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见《党史博览》2010 年第 10 期。

于她的书籍，也谈不上是什么罪行。至于江青“出卖党和国家军事机密”也是子虚乌有。江青交给维特克的地图仅仅是毛泽东在20多年前在陕北的行动路线图，江青意在说明她是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唯一女性（江青在1980年代的“两案”审判中也曾在法庭上提及此事以质疑法庭的合法性）。站在维特克的立场，维特克与邓颖超和康克清的多次谈话从未见中国官方予以质疑或批判，为何与江青的谈话在“四人帮”倒台后就变得大逆不道？由此可见，谈话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与江青谈过话的海外人士并不少，如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关键是维特克抵制了中国官方在事后的无理要求，引发了中国官方的不满，而韩素音这类对中国“友好的作家”处处迎合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径和需要，因此无论何时都是官方的座上宾。

根据张颖的回忆，“1972年的岁末，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恩来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sup>1</sup>且“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都被江青搬走了。”“江青不仅是取走了全部记录材料，并且全部烧毁了。”<sup>2</sup>杨银禄也说：“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跟维特克女士的谈话录音带有多少？’我回答：‘这些录音带是用装电影片子的铁桶装的，有两桶。’周总理又问：‘有人借走过吗？’我说：‘没有。我怕丢失，在广州上飞机以前就用密封条封好了，到现在密封条都没有撕掉。’周总理表扬说：‘那好，你办事还是蛮认真的。这些录音带请你保存好，绝对不能丢失和外传。先放在你那里，如何处理，以后再说。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我说：‘请总理放心，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办！’”<sup>3</sup>文革史家余汝信问得好：“问题是张颖称当年‘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江青把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那末，二十多年后‘实录’中这些谈话‘记录’又从何而来？凭过人的记忆还是凭想象？”<sup>4</sup>抑或是张颖违背组织原则私下保留了江、维谈话的记录稿？

<sup>1</sup>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第163页。

<sup>2</sup> 同上，165—166页。

<sup>3</sup> 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见《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

<sup>4</sup> 余汝信：《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

#### 四、维特克回美后的工作

根据张颖的回忆，维特克回美后，江青立即组织专人为她整理谈话内容，并请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读，周恩来也确实阅读了江青谈话的第一部分，并作了适当的修改。张、姚二人对整理的谈话内容没有表态。周恩来此后召集曾参与会谈的外交部、对外友协人士开过几次会，对是否将整理稿送给维特克一事拿捏不定。后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所有录音带、会谈整理稿全部封存、归档，不许外泄，更不可能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维特克。<sup>1</sup>江青虽然权倾朝野，当初曾信誓旦旦地答应送给维特克录音带和记录稿，这次却在毛泽东和党的机器面前败下阵来。

维特克记述说：“在我 1972 年返回美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通过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提供的外交渠道，江青和我互相交换了很多书籍和照片，两部故事片以及各种消息。然而那些余下的录音文稿的交付问题几个月后还是杳无音讯。我不时地收到传来的消息，说他们用两种语言（中文和英文，就像第一次那样）准备文稿工作量很大，但很快就会搞好。终于在 1973 年 5 月何理良代表大使和其他同志正式通知我，我和江青的谈话记录“过于冗长、很繁杂”，不宜作为有关党和政府的正式报道发表。她向我保证（她和大使在其他场合多次重复了这个指令），我可以自由出版第一份记录手稿（这份手稿与后来江青告诉我的完整的经历密切相关），也可以出版我自己的记录。但我最好不要写成一本‘传记’（这会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非领袖创造历史，而且中共认为毛才是真理和智慧的唯一化身），要‘以毛主席的观点’撰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sup>2</sup>

维特克显然不知道中国高层内部运作的机制与过程，当然对中方的食言自肥有些烦恼。维特克说：“除了第一份记录稿以外，后来的录音文稿都没有交给我，开始我还为此很烦恼，后来又觉得很好奇，因为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中国领导人内部明显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对我显得不太自然的热情中，我察觉到了细微的焦虑，我知道这只是复杂、深刻的分歧和裂痕的外在表现。仅仅阅读毛主席的总结讲话和指示，那些内幕不可能为中国的公众所知。但从长远来看，由于他们最终做出的不交给我江青谈话的官方版本的决定，使我有出了

<sup>1</sup>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第 154—163 页。

<sup>2</sup>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 13 页。

版这本书的自由。这样我可以写下她说的话，外界的有关评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解读，而不仅仅是作为江青的传声筒。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江青一直答应会把录音文稿交给我，而且我在中国之时她从未食言，难道是她自己突然改变决定不把文稿交给我吗？这个决定会不会是出自毛的指示？也许毛受到一些人的挑唆，而那些人对江青蔑视不搞革命英雄主义的原则、为自己歌功颂德、泄露领导人之间残酷斗争的内幕，以及轻率地发表与毛或集体意见截然不同的论调而心怀怨恨？”<sup>1</sup>

然而，中方并未停止施压。维特克说：“最后，在1974年1月，何理良（她那时刚在北京呆了三个月）再次敦促我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传记形式的书，或我所谓的‘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史’。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五月通告’（1973年5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补偿。我自然是拒绝了。出于对江青最初的意愿和对历史的尊重，我认为这些独一无二的记录不应该被埋没起来，所以我继续准备我的出版计划。”<sup>2</sup>张颖在自己的书中否认中方曾设法收买维特克版权的说法，<sup>3</sup>但是证诸华国锋在1976年10月12日与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等人谈话时所说“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中方的确采取了某些行动，只不过遭到维特克的抵制，未能奏效罢了。

虽然中方最终拒绝了提供相关的记录稿，维特克还是着手开展自己的写作。为了进一步了解江青早年在上海的生活、工作情况，维特克专程到了法国巴黎，希望见到江青的前夫唐纳（马绍章或马骥良），以便得到更多的写作素材。唐纳当时在法国巴黎经营一家餐馆——天桥中餐馆。1973年6月的一天维特克与唐纳在巴黎唐人街一家名为“唐城酒家”的中国餐馆会面，维特克希望唐纳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有必要对历史负责，能够提供更多外人所不知的内情。令人遗憾的是，维特克的请求被唐纳所拒绝。<sup>4</sup>虽然窦应泰试图把维特克描写成投机钻营，唯利是图，专门撰写花边新闻和小道消息的无聊文人，但是恰恰反映出维特克作为历史学者对历史负责的认真与执着。

维特克自己说：“经过我稍稍编辑修改过的采访报道，同时又带有自述回忆

<sup>1</sup>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3—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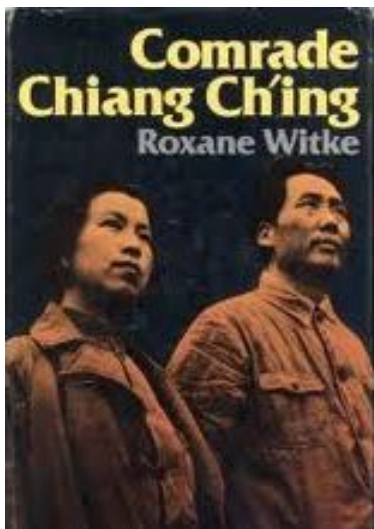
<sup>2</sup>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4页。

<sup>3</sup>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第178页。

<sup>4</sup> 窦应泰：《唐纳拒绝同威特克合作的一笔“生意”》，见《中外书摘》2007年第10期。

录的特征，从长远来看不是为哪个人服务，尤其不是为了江青——她对世界的看法需要一番解释。就我们之间的文化和阶级碰撞和冲突来说，如果仅仅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对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凭着感觉匆匆做出评判，就会辜负了她冒险披露的她对个人和历史见证的本意，也无法进行探索。我没有这样做，我宁愿选择用这样的风格来表现她：用和她在一起之时的经历来完善她的叙述，并以我对她个人和其世界的近身观察及冷眼旁观。正如她曾好几次自信地对我说的那样，因为我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位历史学家。”<sup>1</sup>通过对这段话的理解，维特克显然并非仅仅根据与江青那60个小时的谈话而匆忙成书，维特克尚需作更多的准备工作，诸如收集更多的相关资料，加深对中国革命和中共历史的深入研究等。

从中国回美后，维特克在斯坦福大学呆了一年，又在哈佛大学呆了两年。这两所大学都是美国大学里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问题的顶尖学术机构，不仅有崇高的信誉、众多的学者，还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大量的中文书籍。维特克在这两所学校应是为她自己的写作做必要的准备。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在美国问世。整个西方世界在此之前从未有一部有关江青



的传记，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长久以来深居幕后，外人知之甚少，直到文革爆发，江青才一鸣惊人，在毛泽东的扶植下一夕成名，一跃而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整整十年。而西方世界对江青的了解却微乎其微，所得到的信息大都来自官方新华社的报道，缺乏感性的第一手资料，而维特克的近身采访、实际接触弥补了这一缺陷，尽管这一访谈后的写作未必尽善尽美，但却填补了一项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书书名朴实无华，绝无“红都女皇”一类哗众取宠的噱头，而是取自中共领导人常常自称的“某某同志”，如恩来同志、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等等，中国人读到如此熟悉的语言也许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张颖粗读了《江青同志》英文版后也承认：“江青谈话中的许多细节，作者都作了相当具体详尽的记述”，“全书基本上是按照江青谈话的内容梗概来撰写

<sup>1</sup>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6页。

的”。张颖同时承认“作者并没有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有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张颖将维特克没有“一味吹捧江青”归结为“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已起了截然不同的变化”。<sup>1</sup>换句话说，按照张颖的逻辑，如果江青还在台上，维特克一定会出版一部对江青歌功颂德的书，这确实是对西方学者带有偏见的看法。江青在台上掌权时，维特克尚且拒绝中方对其写作的横加干涉和无理要求，更拒绝了中方的收买，维特克有什么理由听从江青或中方的指令撰写一部迎合中共领导者心目中的“中国革命史”或“江青传”？如果那样的书在美国出版，作为历史学家的维特克岂非无地自容，还能立足于美国学术界吗？正如维特克书中所言：“如果主席或中央委员会要求一部纯粹歌颂江青的作品，他们大可自己编撰一份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予以传播。”<sup>2</sup>

中方为何千方百计地设法阻止维特克出版有关江青的书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其实，仔细阅读《江青同志》一书，我们可以看出，中方并非完全阻止维特克出书，中方的真实意图是要求维特克配合，期望维特克书中的观点和内容符合中方的要求，即“以毛主席的观点撰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可惜的是，维特克并不买账，不理睬中方的劝告，仍以自己的方式撰写和出版关于江青的书籍，这使中方大失所望。阻止江青谈话稿送交维特克的决定应该是来自毛泽东，周恩来自己绝不敢冒抵制江青的风险。迄今为止，我们尚不清楚毛泽东出于何种考虑做出这一决定。笔者认为，后面事情的发展则是由于江青的倒台，官方出于“深揭狠批江青反党集团罪行”的目的，将这一事件人为地炒大，无限上纲，而维特克也就成为现成的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的对象。

笔者还愿指出的是，大陆一些作者不是在学术上探究《江青同志》一书的得失，而是在维特克的所谓动机上大做文章，按照官方的口径人云亦云，似乎只要证明维特克采访江青是别有用心、图名为利，积极配合了江青“树碑立传”、“篡党夺权”的阴谋，即可否定维特克学术上的努力和成就。就事实而言，大陆的作家们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的这些观点。笔者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国内的研究者就《江青同志》一书作过任何像样的研究，相反，他们总是在子虚乌有的《红都女

<sup>1</sup>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76页。

<sup>2</sup>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5—16页。

皇》问题上打转转。这不能不说是大陆学术界的一大缺憾。

顺带一提的是，有关维特克与所谓的《红都女皇》的流言，文革史家余汝信对此已作了详尽而透彻的剖析，可参见本文开头部分所提示的相关文章。此处不赘。

## 五、持续关注中国事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外也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变化。1977年3月2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刊登了维特克的长文《江青同志讲述她自己的故事》(Comrade Chiang Ching Tells Her Story)。

为便于不知江青是何许人的读者明白，封面上的标题改成了“毛夫人讲述她的故事”(见右图)。这是维特克在返回美国后首次公开披露她在1972年夏的中国之行。维特克在文章中讲述了她的中国之行和与江青的谈话。文中记述了江青曲折、复杂的一生，从她的童年到演艺生涯，从上海到延安，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毛泽东的家庭生活，中苏关系的矛盾与冲突，江青在文革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江青与文艺革命，江青对西方艺术的评论等。维特克指



出，毛泽东曾在1966年7月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毛曾预言在他死后，反共的右派会上台，此信可以看成是毛给江青的政治上的交代……

1977年，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由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出版发行。此书日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日文等。但是，叶永烈称该书第一次印了三万五千册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里顺带一提的是，2006年香港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但是书名却冠以“红都女皇”，原书名“江青同志”反倒成了陪衬，这不仅违背了维特克的原意，且该书也未获得维特克的授权，侵犯了维特克版权，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1980年到1981年初，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理并判刑，美联社在1981年1月26日从北京发回报道《中国法庭判决



毛的遗孀死刑》(*Chinese Court sentences widow of Mao to death*), 该报道还配有一张江青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照片, 维特克特别保留了当天发表在纽约地方报纸上的这条消息。

十年之后的1991年5月14日, 江青在北京自杀身亡。同年12月维特克在《浮华世界》(*Vanity Fair*)第12期上发表长篇文章《毛夫人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Madame Mao*)。在这篇长文中, 维特克全面回顾了江青的一生, 涉及到江青早年时期的活动, 在上海和延安的经历, 与毛泽东的婚姻, 毛泽东家庭成员的状况, 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江青在文革期间的主要活动等。维特克用了较长的篇幅叙述了江青在1976年10月被捕和关押以及审判之后的生活经历等。

维特克在文中还提及1972年8月那段她与江青会面交谈的情景。维特克说: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代问题的历史学家, 我作为客人受邀访问北京, 与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以及其他长征老战士的夫人们作了访谈。江青知道此事后要求见我,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面。” “在我与她交谈的60多个小时里, 我发现江青身上充满了矛盾, 我了解到江青对周围事务的强烈统治欲, 直截了当且富有感召力的语言和喜怒无常的情绪, 此一时充满了友善, 彼一时却又仇恨满腔, 尤其针对那些被她认为错待她的人或事。……当她讲述中共党史有关事件时, 她的坐姿僵直, 她的语调变得低沉, 她的眼神趋向冷酷。但当讲述到‘江青是怎样脱颖而出’时, 她看上去表情极为自然, 她的肢体语言变得流畅, 她的声调和举止毫无矫揉造作的女性化、敏感和引人入胜。” 维特克认为, “长久以来, 人们认为没有毛泽东, 江青不可能爬到这么高的地位。然而人们也许没有意识到, 如果没有江青这般全身心投入到她丈夫那一以贯之的最高权力的斗争, 毛也许不会长期盘踞最高领导者的地位直至死亡。自1938年在延安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 他们从来都没有背弃对方。”<sup>1</sup> 毛泽东与江青在政治上是一体的, 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一点来看, 维特克比国内某些官方学者看得更清楚, 更一针见血。

2006年5月12日到14日, 在美国纽约召开了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 不少媒体前来采访。会议召开前笔者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专门采访。BBC记者对笔者采访的前一天也专程采访了维特克女士, 请维特克就文革

<sup>1</sup> 《浮华世界》*Vanity Fair*, 1991年第12期138—141页。

史和有关的江青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事后 BBC 作了专门报道。据笔者所知，维特克虽然早已退休，但是仍然关心中国事务和发展，也关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

## 六. 几句题外话

走笔至此，笔者心生几许感慨。文革期间，中共曾制造了对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国》的大批判，还制造了外贸部为引进彩电显像管考察美国康宁公司的所谓“蜗牛事件”。这两起事件在文革后都重新予以评价，承认那是在文革特殊情况下制造出来的闹剧。其实，维特克在访问中国后遭到的不公正评论与前两起事件颇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是“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制造出来，且迄今为止无论是官方学者还是国内的当事人以及文学作者都无意予以重新评论。维特克访华与江青谈话和坊间传言的《红都女皇》毫不相干，维特克既没有非法获取“党和国家机密”，也没有昧着史学良知杜撰历史。正如维特克自己所说：“作为一个到访中国的历史学家，我只代表我自己，在我确认我所得到的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出版之前，我不会提供给任何人。”

此书将向普罗大众介绍江青的非常的一生以及与革命历史紧密相关的事迹。”<sup>1</sup>事实证明，维特克是一位严谨、严肃的历史学者，为了研究中国妇女运动，她在文革期间克服种种困难访问中国，与中国妇女界领导人谈话，并与江青见面会谈，事后更潜心工作多年，在西方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江青的传记，应该说这是维特克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岂能因为江青是被官方定性的反面人物而由此否定维特克的学术成就？我们应该从学术角度研讨该书，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维特克访华事件，而非简单重复当年官方“揭批查”时搞出来的大批判材料，更不应人云亦云地在人格上抹黑维特克。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江青的倒台，维特克无端地被卷入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至今仍被中国的一些当事人和文学作者们所曲解、误判，难道人们不应认真地反省这段历史，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难道还要再继续流传下去吗？■

此文原载《记忆》64期

<sup>1</sup> 维特克：《江青同志》英文版，14页。

【文摘】

## 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

### ——文革史读书札记之二

余汝信

约十年前，友人送笔者一册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英文版原著《江青同志》（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部与传主长达60多小时谈话后完成的、有关这位文革时期最显赫人物的严肃而又立场超然的力作，为什么在面世十多年后，在海内外都没有中文版？至今，匆匆又过了十年，仍然未见其中译本，这确实是很令人惋惜的。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在中国大陆，涉及到这本书及江青那一次与维特克谈话经过的所谓“实录”、“纪实文学”，如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叶永烈的《江青传》、陈东林、杜蒲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邬吉成、王凡的《红色警卫》，以及杨银禄在香港出版的《我给江青当秘书》等，内中谬误或不确之处比比皆是（即便是亲身经历者所著亦不例外），而未看过《江青同志》一书者又难以明辨真伪，有感于此，特作本文，以匡正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述的该书“序言”和第一章“邂逅”部分段落的译文，均为笔者与友人合译，虽已力求忠于原著，惟因水平所限，肯定未臻精当，请识者不吝赐教。

### 一、有关罗克珊·维特克

罗克珊·维特克于1972年应邀访华时，尚是一位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inghamton）任教的青年学者。她毕业于史丹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六十年代末在台湾作研究工作，专攻中国近现代史，懂中文，能以汉语会话。1970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完成她的博士论文《五四运动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前，与罗伯特·林顿合著有《〈红旗飘飘〉文集指南》（*The Red Flag Waves*,

*guide to the Hung-Chi Piao-Piao collection*) , 1968年由柏克莱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可以说,她在当时美国人数不多的中国问题学者群中虽不算大家,却也小有名气。

## 二、偶遇中国代表团

在《江青同志》一书的第一章“邂逅”里,维特克生动地忆及导致1972年中国之旅的一次巧遇。

“我的中国之行取得意想不到的进展是缘于中美之间在结束持续了二十年的‘互不承认’的状态后,1971年夏天中美关系发生的戏剧性逆转”,“这种逆转来得非常迅速。秋天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中国人娴熟的文化外交活动也延伸到了美国。我国民众渴望体验‘真实’的中国的愿望突然变得似乎永不满足。我与那些跑到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急着办签证的同事不一样,我没有这样做,1950年代冷战期间的成长经历使我深信,我1960年代的教学和研究课题,即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明史仍然是‘学术’方面的问题——我并不急于亲历其中”。(P17—18,原书页码,下同)。

“捉摸不定的机遇结束了那种超然的态度,1971年深秋,我例行到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一家不太豪华的饭店——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上用过早餐后,当我在大堂浏览《纽约时报》的时候,我被一队急速走过的人所吸引,他们穿着笔挺,目视前方,短发刚刚仔细地修剪过,穿着海蓝色的高领外衣。很明显这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达美国。这些官员临时住在14楼,我也住在同一家饭店里,但对这种神奇的巧合竟然一无所知。我还有一些时间,于是冲进电梯按下‘14’那个按钮,意识里只想着看看这些从北京来的严肃的使者与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的是否一致。他们是否在享用典型的中国北方早餐:粗糙的‘火烧’和烙饼,或许正把他们的茶壶放到饭店陈旧的电热炉上烧开水?”(P18)

“门开了,见到两名高大的警察,还有一个穿着侍者衣服的人。‘请出示证件’,一位警官要求。我照做了,‘什么事?’当时我说了一些学术方面对中国比较关注等愚蠢的话。就在那时,我看见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在门旁好奇地四处观望。我用中文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然后问他和他的同胞在一个美国

城市里感觉怎样。他有些震惊，然后走开了。门后面匆匆出现一个苗条的人，穿着短袖衬衣和直筒裤。‘我姓刘’，他说话比较紧张，同时陪着我到一个小房间里。我们坐了下来，然后他给我倒茶、递香烟，都是中国货。接着我们开始用汉语、法语和英语彬彬有礼的交谈，谈到中国外交的转变，交换留学生的可能性（当然还‘很遥远’）以及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观念和思想相互交流的可能性问题。那次谈话是有分寸的而不承担什么义务，我们都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P18）。

“当我带着刘先生悄悄提出的下次再来的邀请离开时，那个穿着侍者衣服的人跟着我进了电梯。下降过程中，他显得很精明地对我说：‘你以为我是一名侍者，但实际上我是一名侦探。不仅如此，我还是约翰·杰伊大学的学生。如果你真是你所声称的教授——我实在怀疑——那你能够不能够批改我的关于生态学方面的学期论文？’出了电梯后我径直向街上跑去，他还不断地说着，经过了几个充满了行人的街区后，才把他甩掉了”。（P19）

那名侦探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维特克当时虽年过三十，但长相年轻，活力十足，模样可人，实在不像一位教授，以至到中国后，张颖等人凭长相对漂亮的维特克的学识常常也带有疑问。

### 三、与何理良的交往

维特克接下来讲述了她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再次交往：“几个星期后又因为另一学术活动回到纽约，那时中国代表团已经住进了一家位于西区第66街的饭店里”，“由于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我决定再次拜访他们。这次却不是那么容易了，我前前后后打了大概二十个电话。其中有一个被误接到中华民国（台湾）驻联合国的办公室（那时即将搬走），电话里传来一个狂怒的男人声音，咆哮着说，‘共匪不住这里！’”（P19）

“又拨了几个电话后，我终于接通了刘先生的一位同事何理良女士，她是黄华大使的夫人，同时也担任代表团的顾问。黄华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也是多年来一直在国外工作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她促成了当天下午的拜访。我们的谈话在汉语和法语之间变换（当时法语是她的主要外交语言），当时担任代表团二等秘书的高粱也参加了谈话。高粱身形魁梧，精力充沛，兴致也很高，他只说汉

语。从交谈中可以察觉，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知道了‘现代中国的女权运动’是我正准备出版的一本书的主题，我的研究方向使我对他们现在的革命前辈的革命经历很熟悉。他们也知道了我是那部未全文翻译的16卷革命者回忆录文摘《红旗飘飘》的合著者之一。在评论这部文摘的时候，他们提醒我其中一些撰稿人，即那些被打倒的同志们思想‘包含着错误’。他们也对我就他们的主席早期的文章做的一项调查工作很好奇，我把它称作‘五四时期的毛、妇女和自杀’。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中妇女的困难处境时，何理良对我保证，如果妇女参加无产阶级斗争，男女平等就会实现。

而我则提到在结束两年的亚、欧学术研究后，我1967年秋返回伯克莱，期间读了很多关于江青的报道，我对她很感兴趣。这位曾经令人琢磨不透的毛泽东夫人，突然开始在全国人民面前发号施令，四处攻击老一辈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禁不住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来进行一项几乎不能的计划——记述她的故事。直到1966年公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她本人和她可能扮演的任何政治角色一直被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很少提及。中央的这种沉默使中国观察家们作出了各种各样轻率的猜测，他们对出现一位操纵大权的中国女性感到既惊讶又兴奋。”

(P19-20)

“我谈到江青在国外令人反感的形象使何理良引起注意并感到愤怒。她承认江青是一个有独创性的革命者，但是说我不应该老是纠缠她的过去。我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她还说只有我亲眼到这个国家看看，同人民群众直接对话，才能避免以国外图书馆里一些错误的，或是不令人满意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学术性’写作的缺陷。”(P20)

根据维特克本人以上叙述，可知：

1、中国代表团对维特克的个人背景进行过调查，了解到她是一位以中共的标准衡量政治态度尚为中立、客观，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研究学者；

2、出于争取维特克“了解中国”，为我所用的目的，中国代表团（至少是何理良及高粱）有意促成其访华。

#### 四、对外友协的邀请，免费的中国之旅

对何理良称要和高粱代表其给北京写信，维特克说：“当然我对此并不介意。对她的建议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我又回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教学，并继续1920年代中国女权运动史的写作。几个星期后，高粱给我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带着兴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政府处理与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事务的机构）已经邀请我在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它将承担我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高还告诉我不必去渥太华，只要把护照——一本清除掉曾去过台湾的记录的新护照——送给他就可以了。几天之后护照就被送了回来，装在一个棕色的信封里，签证也附在一起”。（P20）

参加了维特克访华接待工作的张颖说，维特克访华是“经她本人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sup>1</sup>此说不确。内情如前所述，应是中国代表团主动邀请，不过是借了维特克本人要求的名义报告国内，主动者是中方，否则，中方也不会主动承担其在华期间的“所有费用”。

“7月18日，我飞赴香港，在启德机场我受到了‘我们的朋友’友好协会和和蔼可亲的代表的接待，我被送到一家不太引人注目的酒店。第二天早上，这些朋友的领导赖先生，和其他偷偷跟着我的两个人，陪同我坐火车穿过九龙半岛到达深圳——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检查站。在那里我站在一种文明的边缘，对它，我仅仅知道一些历史，几乎想不出现实的景象”。“从深圳我继续坐火车到广州，我被交给地方友好协会的两位女成员，一位比较年轻，另一位是中年妇女，都特别热情。在经过一段时间午睡（这是她们强加给我的习惯——我只有假装睡觉）和享用非常可口的、具有典型南方特色的晚餐后，我继续坐飞机去北京。但是在路上，我们极其谨慎的飞行员接到了危险天气的预报，随后突然决定在郑州停一个晚上，……早上继续完成了飞行，到达了北京”。（P21）

叶永烈在他的号称为国内外第一本江青全传——《江青传》中说：“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sup>1</sup>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页19。张颖，章文晋夫人，1922年生于广州，1937年到延安，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Witke)”，<sup>1</sup>这一段情节实为编造。按维特克自述，她受邀访华是独自成行，根本没有一个什么“美国妇女代表团”。从广州至郑州再飞北京的，也不可能是什麼波音客机，首架波音707客机在1973年9月才引进中国，在1972年，中国提供给外国访客最好的飞机（即使是专机）是苏式的伊尔-18和伊尔-62。

## 五、采访邓颖超和康克清

维特克抵达北京机场，“在机场我受到了友好协会北京分部的接待。我们的车行驶在一条从首都辐射出来的两旁都是翠绿的柳树的公路上，我和在接下来的六个半星期里将要陪同我的三位代表闲聊起来：于世莲，一位老练的翻译，大概三十多岁；陈文超（译音）是一位正在接受培训的翻译，他刚刚三十出头；以及陈明仙，我们通常叫她老陈（表示尊敬的意思），她比我们都年长，大概已年过四十”。（P21）

“在下榻北京饭店不久，我被要求起草一份我的旅行路线计划，以及一份我想采访的人的名单。旅行计划包括主要的场所和城市，都是比较普通的。我提出的采访对象很多，从我预想可以见得到的直至几乎不可能见到的人，其中包括本书的主人公，不过是出于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和革命文化的权威形式上的礼貌。那时我没有抱任何希望，而且因为她令人生畏的声望，我也没有想到要见她”。（P22）

“三周时间里，我主要游览了北京，那里过去曾被皇帝拥有，而现在是革命的首都；然后我飞到西北，参观了西安，曾经是历史上辉煌的唐朝（公元618—960）充满了魔幻的首都；然后去了延安，那是一个偏僻的小镇，经过翻新粉刷，被作为崇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圣坛。”每到一地，翻译都安排维特克和不同年龄的男女见面，维特克认为，“他们一成不变的政治性发言是令人苦恼的”，“绝大多数关于过去的旧社会和现在的新时代、罪恶的刘少奇（显然是毛抛弃的第一位接班人）和非凡的毛的汇报都极其简单，使我不得不告诉要对我的工作成绩负责的几位同伴，如果他们期望外国读者会读我的有关中国妇女的描述，那么我们的中心应该转移。不应该完全谈这些人民群众中的‘典型成员’，他们已经变得很普通因而外国人对他们没有兴趣，如果我见一些不平常的人——当然他们

<sup>1</sup> 叶永烈：《江青传》（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页467。



的姓名起码要为国外所知——展现出他们是怎样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的，这样不是更好吗？”（P22—23）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在旅程的第三个星期，我采访的层次逐步提高，当然相互间的挑战也随之升级”。“8月11日晚，我的几位陪同显得比平常更为激动地向我宣布第二天上午邓颖超（主管革命妇女工作，也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和康克清（红军之父朱德的从戎夫人）将和我讨论妇女运动的起源问题，我研究课题的主线和她们的生活经历相当吻合，这使我至少可以说有些慰藉”。“我冲下宾馆的楼梯，跳进夜晚的热浪中，来到几乎被照得通明的天安门广场，我不被人注意地加入到人群中，四处乱转，直到凌晨。小睡了一会儿，然后起床准备九点钟在外交部的会面。还有其他一些妇女领导人参加了我和邓颖超、康克清的会见，可是很显然比起这两位革命的主要人物来说，她们的地位没有那么重要。邓颖超将近七十岁，表现出敏捷的才智，颇具幽默感。那天早上，她回忆起了过去五十年里遇到的一些危急关头，都是从很少人知道的革命的妇女方面的问题来论述的。”（P23）

## 六、“二十分钟后出发”

“我的脑子里满是过去激动人心的事，有些头昏脑胀。回到北京饭店后，我第一次睡了一个中国式的午觉。后来被于世莲叫醒了，令我很是迷惑不解，因为每天那个时候都是她和其他人打瞌睡的时间。于压低声音对我说，‘今天下午一些年轻同志们可能会到你房间来拜访你，’‘谁？’‘我也不知道’，她推托地回答。刚过一会儿，她又出现在我的门口，告诉我年轻同志们很有可能就要来拜访我，‘你最好收拾一下，我会准备一些好茶叶和干净的杯子’。我整理桌子的纸和书的时候，茶杯的托盘、矿泉水和一盘堆着像金字塔的新鲜水果也送了进来。于又回来了，眼里闪烁着激动和兴奋，‘她们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似乎她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P24）

“三点整，两名具有严肃的革命风格、极具吸引力的年轻女性，站了在我的门前。徐尔维和沈若芸同我握手之后，带着高层党务工作者的诚恳作了自我介绍。我用汉语向她们问好，她们用标准的英语作了回答，带着上层英国人的口音。‘江青同志想让你了解她的政治思想’，沈开始谈话，‘她指示我们把她文化大革命

期间的四次讲话读给你听。’ ‘为什么这么急?’ 我问道, 觉得很奇怪。‘我们对此也不知道,’ 她们微笑着回答, 然后开始工作” (P24)。

“在那两个半小时里, 期间仅仅因为喝水而中断了一次, 她们用英语读着江青同志 1966 年 2 月在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一篇冗长的讲话稿”,<sup>1</sup> “他们告诉我, 我的任务不仅是要认真地听, 而且要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大胆地写。在听这些辞藻华丽的或重复的篇章过程中, 如果我的笔停了下来, 她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人一起就会盯着我, 直到我重新写下去为止” (P24)。“‘为什么不让我自己看这些原文呢?’ ‘因为江青同志指示我们读给你听。’ 那时我的预感——后来在我回到美国能够研究江青讲话的记录时得到了证实——是原始的印刷版本, 大多数在中国是严格限制发行的, 其中还战友般地提及到林彪、陈伯达和其他‘文化大革命’的领航人, 他们后来都被驱逐出革命队伍。” (P24—25)

“他们继续读, 我继续记, 一直至于向她们示意为止, 已经五点半了。她们立即拾起她们的黑色塑料包(象征干部地位的包)和江青未经审查的讲话稿, 然后和我作了一个迅速的告别。于告诉我说最好洗一洗, 收拾干净。但是我和缔造了这个特别的社会秩序的女性们在一起谈了一个上午, 然后又在热浪中写了一个下午, 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告诉于, 晚上我想静静地一个人吃一顿晚餐, 写下我的一些想法之后早点睡觉, 好好休息一下。”

“‘你不能那样,’ 她坚决地回答道。‘为什么?’ ‘因为今天晚上江青同志有可能会有时间会见你, 所以动作快点吧!’ 一会儿工夫, ‘有可能’变成了‘很可能’, 接着变成了‘肯定’。对这次会见的性质, 地点、甚至目的, 我都一无所知”。“‘二十分钟后出发!’ 于匆匆对我说。我赶快脱掉从早上五点就一直穿在身上, 已经被汗水浸透了的衬衫和裤子, 冲进浴室洗了个凉水浴, 吃了双份剂量的头痛药后, 钻进于选中的我的两套旅行服中的一套, 她说‘黑色的比红色的好一些。’” (P25)。

“我们的车行驶在长安街上的时候, 我提醒自己, 中国人的好客是闻名四海。还有就是他们能够通过纵容客人的兴趣和爱好而控制客人, 从而使客人放松警惕。随着我们的车慢慢靠近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领导人组织重大政治活动和娱乐表演的地方, 那晚看起来好像是试探性的安排, 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sup>1</sup> 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因为江青向一个外国人发出了邀请，这是很少有过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由她来决定一切。媒体被动员起来制造一种官方的气氛。我们登上台阶的时候，党的新闻机构新华社的摄影师一下聚到跟前，不停地拍照，跑前跑后地用电视摄影机摄像。到了大厅里面，我飞快地向江青的众多随从点头致意，互相介绍姓名，其中包括毛泽东很有名气的侄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sup>1</sup>

穿过好几个厅之后我们被带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巨大门廊里停了下来。有一个人清了清嗓子，抬高声调宣布江青同志就在旁边的房间里面，‘差不多准备好了。’”（P25—26）

张颖在25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说，8月12日这天江青见维特克是在下午“两点三刻”始，<sup>2</sup>对照维特克本人对这天活动的详细叙述，看来是张的回忆有误，维特克从北京饭店抵达人民大会堂的时间应在下午六时左右。此外，张颖接下来在回忆录中大段地引述了江、维“两人的原话”，但以张引述维特克见到江时的第一句话“见到你，江青夫人，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你，那么我还算来过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来看，这些“原话”涉嫌编造的成分居多，维特克懂中文，见到江青这样地位的人，为表示敬意，应用“您”而不会用“你”，更不会把江青称之为“江青夫人”，无论以中文或英文的习惯来说，江青都应是“毛夫人”或“江青女士”而决不是什么“江青夫人”。为使有兴趣的读者有所鉴别，笔者将维特克本人所述的初见江青一段全文译出如后。

## 七、“门开了，江青昂首阔步走了进来”

“门开了，江青昂首阔步走了进来，微笑着伸出了手。她抓住我的手，凝视着我的眼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我们的手放了下来，彼此眼睛却还是对望着——也许持续了两分钟——在接下来开始说话之前。

‘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她说。

‘我实际要比看起来老，’我回答道，希望她不会失望。

她笑了，说她年纪越来越大，马上就要六十岁了。我忍着没有说出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因为即使在革命时代，年龄大是一个代表着资历很老的

<sup>1</sup> 王海容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7月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sup>2</sup>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页20。

优势。接下来谈话的时候，她毫不掩饰地仔细观察了我的脸、头发、衣着和高跟凉鞋，对她的好奇心一点都不加隐藏。我也同样很好奇，但我相信我观察的时候不像她那样咄咄逼人。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我也曾在60年代初以来有关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过。她的很好的橄榄脸色在热气中闪闪发亮。她的鼻子和面颊完全是雕刻出来的，造型和毛泽东的有些像。她鼻尖上肉色的痣和嘴角的右下角化妆得很好，掩盖了她的缺陷。

她身高不过五英尺五英寸，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数山东人那样）。她站在我面前要矮寸，皱着眉头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纤细，骨骼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细，走起路来比较轻柔优雅。她的手很精致，手指非常细，正如古代诗人所称的‘纤纤玉指’，动作就像流水一样。

她的衣着比较保守——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衬的束腰外套，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她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

她的装束的风格、裁剪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细很多。和邓的一样，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她们衣服的肩都很引人注目，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

站在江青左边显得不太自在的是姚文元，江青热心地把他介绍为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始一直从事忠实的革命文学工作的人。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肩膀，脑门有些秃。姚穿着上层领导干部统一的珍珠灰色的棉布束腰外衣。他是现场所有男性中唯一戴典型的工人帽的人，帽子的顶很柔软，帽舌很窄。穿着亮泽的塑料鞋，他的身体重心不安地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别人谈话的时候他反复地把帽子脱下来又戴上去。那第一次见面中，他的举止风度非常官式，从来不会浪费他的时间。他比江青小十多岁，明显地对江青很顺从，每次江青谈到什么话题时他都赶快跟着答腔。

江青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然后开始了历史和文学方面的漫谈，彼此对对方的文化作一些徒然的评论。我们也用普通话谈了一会儿，但晚上谈论的主题——她过去的的生活、现在的工作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见——都通过译员翻译成了英

语。当时担任翻译的竟然是沈若芸和徐尔维，江青下午派来的两位厉害的使者。因为这次见面是我在中国期间进行的最为活泼的谈话，谈的内容都是预想不到的，我告诉江青我已经完全忘了记笔记。她向我保证，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已经被录音，速记员也做了记录，在其他领导同志批准之后，会将谈话内容文稿的中文和英文版本交给我。”<sup>1</sup>（P26—27）。

“装在有盖子的青瓷色杯子里的茶送了上来，散发着芬芳的气味，茶杯是以宋代的模型制造的。除了江青的茶杯把上系着一根红色的细线，以及她身旁桌子上放着一个用毛巾裹着一个电控呼叫按钮外，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晚宴是在另一间宽敞的房间里进行的，我们坐了一个圆桌，参加的有十个人，包括我们俩还有她的八位助手。我坐在江青的左边，我的左边是姚文元。菜单主要围绕经典名菜北京烤鸭——我说那是我的最爱。她大笑着说她知道”。（P28）

## 八、是周恩来主动建议江青见维特克

我们继续引述维特克有关8月12日晚宴上的谈话。

“她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她说周总理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建议她应该接见哪些外国客人。当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惠勒·斯诺1970年9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安排接待工作。通知江青参加接待的时候，她正在小睡。因为没有任何提前的通知，她一时不知道应该送给尊贵的客人一份什么样的合适礼物。而在斯诺夫人这一边，她也被弄得有些混乱，结果意外地把本来准备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送给了江青！”

“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道。

“虽然曾经读过很多斯诺写的书和文章，我没有见过他们，对于他的作品我们只聊了几句。然而，我和他的前妻奈·威尔士有联系，她曾经在1930年代末期采访过中国的女性革命领导人。

“他现在的妻子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见到她，请转达我对她和她的人家的问候以及欢迎她再次来访。你成为中国的朋友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看看

---

<sup>1</sup> 维特克原注：那个版本就是本书中大多数直接摘录的江青讲话的来源，除了一些注明来自于文献资料的以外。接下来的几次见面中，我不断地作记录，记下她说的话以及随从人员和译员在她的经历基础上做的一些解释。

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接待你。’

提到将来和死亡的时候，她的情绪变得严肃起来。她望着桌上的其他人说，‘辩证唯物主义者能理解人生老病死的规律。保持人政治上的年轻是可能的，但是永远保持身体健康却很困难。现在我承认我老了。’

跟着她的突然情绪变化，姚文元开始背诗：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这几句诗写得非常好，’姚感叹道。

‘这首诗的其他几句也很不错。’江青继续念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后面还有四句，’她提到，接着又说，‘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那首诗把江青的思绪带到了长寿和身体康宁的关系上。就像她的生活经历将要揭示的那样，她长期为病魔所累，已经把疾病和个人的敌人当作身体和政治上生存意志面对的两个并行的挑战。她的筷子飞快地掠过几道新上的菜，同时说道，‘最近我一直在休息。但是因为你，我今天就过来了。近来我身体比较差，睡眠也不太好。我需要药物治疗和休息，也需要体育活动。’

‘你一般都做什么运动？’我问道。

‘游泳、骑马、慢走，还有整理花园，’她一边回答，一边把手伸进口袋拿出来一把茉莉花，是在中南海（毛的家庭居住的地方，在北京以前的皇宫内）自己种的。她把那些气味浓烈的白花放到我手里的时候，她的脸都印出了我的吃惊和高兴。‘我还种一些中草药，’她补充道。‘我自己种茉莉花，还种各种各样的蔬菜。除此之外，我还种了一小块棉花。所有这些都帮助我精神上和身体上得到放松。’”（P29—30）

如果我们相信维特克的叙述是准确的，那么，根据以上江青对她所说，江青会见维特克是周恩来建议的。后来在广州，江青再次提起：“她回想起我们两星期以前的第一次会面幕后的情况，她说周总理问过她想不想见我。周总理告诉她我‘很年轻，对中国充满热情’，而且在我同那个联合国代表团谈话之后，又得到了约翰·S·谢伟思的推荐”。<sup>1</sup>（P38—39）

<sup>1</sup> 维特克原注：谢伟思是1940年代中期访问延安的美国迪克西（Dixie）代表团的一员。他公正地报道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的生活，与美国国务院的论调完全相反，他的报道里都是对中共的赞美之辞，结果受到了美国国务院公开的咒骂。

维特克访华是由对外友协发出正式邀请并负责接待的，据主持接待工作的对外友协秘书长丁雪松后来回忆，是周恩来于1972年8月10日将据对外友协陪同人员反映的维特克表示希望见到江青的报告批给江：“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sup>1</sup>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却有如此说法：“维特克来华是为采访现代中国妇女革命史料的，中国对外友协事先商定她采访邓颖超、康克清等人。江青知道后，执意要会见维特克。周恩来只好同意，特意指示：只见一次，只谈文艺”。<sup>2</sup>《红色警卫》关于此过程的说法与《实录》如出一辙，想必是照抄前者的。<sup>3</sup>将丁雪松的回忆与维特克的叙述相比照，可以得知，《实录》与《红色警卫》的说法是本末倒置：

1、维特克的采访计划，并不是与对外友协“事先商定”的，而是到了北京之后由维特克书面提出，对外友协因应实际情况逐步完善的；

2、是周恩来主动将对外友协陪同人员反映维特克希望能见到江青的报告批转江青，建议江青可以一见，周是主动建议，不是被动地“只好同意”的；

3、在周恩来批转报告给江之前，在北戴河休养的江青根本不知道维特克访华一事及维特克此人，更不可能“执意要会见维特克”；

4、据丁雪松所转述的周的批示，周对江怀有关切之情，“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是从江的身体状况出发，为江所着想，而并非划了一个圈子规定江只能谈什么，不能谈什么（以常识计，周对江也不可能划这样的圈子），更未有“指示”过什么“只见一次，只谈文艺”。

## 九、“江上有奇峰”极有可能是毛为江所作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又从晚宴上来到天桥剧场观看江青改革的第一个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所有的文艺都要达到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sup>1</sup> 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丁雪松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省略号是原有的，省略了什么，不得而知。

<sup>2</sup> 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850）。

<sup>3</sup> 郭吉成、王凡：《红色警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页210。

戏剧结束后，江青得意洋洋地退场，把我引到剧场的私人会客室，我们又坐到一个大沙发上。关上门，散场观众的喧闹声都听不见了。她专注地看着我，说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

‘一个令人敬畏的榜样！’我回答道，颇有些诚惶诚恐，但是我明白我们之间的真正的问题是信任。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把你洗脑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吗？’

‘不，我不怕。这种洗脑是不可能的。’

‘毕竟，’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也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你都可以竞选总统！’

她转到了更加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现在的角色。她说我是第一个了解她的过去历史的外国人，然后又提到了发表这次会见内容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不是把你当成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好朋友。首先我还得请总理检查这次会谈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很显然，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领袖）走的是一条曲折困难的道路。即使我现在都快六十了，我仍然有决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

她就解释‘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还有什么要说吗？’我问她。

‘这次没有时间了。下次你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再谈。同时我会送给你一些纪念品。虽然我是一名技术不怎样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我会送给你一些我拍的作品留作纪念。也许这是‘班门弄斧’。我现在身上没带好的作品。我曾经拍过女民兵的照片，但某些人拿走了些好的。我回中南海的家里要好好找一找。’

我们在剧院里告别的时候，剧院里除了她的随从人员几乎没有别人，她让我先走，以便她晚上回去的时候不被人看见。”（P33—34）

“在我与江青那次突然的会面后，沈开始不分白天晚上，每天不定时地来找我。除了读一些政治性的资料外，她还给我一些江青和毛泽东 1940 年代在延安的未发表的照片，一些她个人拍的彩色艺术照，一套陶瓷大熊猫（是著名的景德镇制作的，尽管这种制品从封建时代开始就不断衰落），还有其他有关江青生活的纪念品”。（P35）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在她送给我的艺术照片



之中，有一张是庐山的汉阳峰（见卷首插图），在照片背面，她抄下了一首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诗（这首诗与他在1960年代初所作的其他诗的风格和主旨很相似）。诗历来就有表面上写自然，而实际上影射政治的传统，在这首诗中毛泽东把江青比作锁在江河上的薄雾中的奇峰（江青姓名的‘江’字意思是‘江河’）”。（P5）

这张题为“庐山汉阳峰”的照片背面“有用红色铅笔写的题词”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诗赠维特克夫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江已表明，照片是她所摄，至于照片背面江所题的诗，维特克说“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诗。”到底是江青亲口告诉她的，还是她本人的猜测，我们不得而知。张颖书中说江青谈话时讲过这首诗是她自己写的，<sup>1</sup>我们已经说过，张颖所引用的对话很不可靠，相反，维特克的说法较有道理。

“庐山汉阳峰”一诗与中共官方正式发表的毛于1961年9月写给江青的那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毛原题“为李云鹤所摄照片而作”）风格十分相似——“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山在险峰”。<sup>2</sup>

而且，写作时间亦应相近。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拍的照片“太多了”，即使是“近几年”就有“大概一万张左右，但是她销毁了三、四千张，还有很多要去掉”。在上万张照片中选出三数张较好的供丈夫鉴赏题诗，大概不是什么难事，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江青在庐山摄的仙人洞及汉阳峰两张照片，艺术上说还过得去，但毛的诗意与画面似乎则不太吻合。仙人洞那首，照片画面为从仙人洞处摄得的御碑亭远景（此亭相传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建），“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应该是御碑亭而不是仙人洞，题目也应该是“御碑亭照”而不是“仙人洞照”，因为画面上根本没有仙人洞；至于汉阳峰一图，应为从含鄱口处所摄得，从该处晴日可见鄱阳湖，但见不到长江，虽然整个庐山大体上可以说是在长江边（毛亦有诗云：“一山飞峙大江边”），但作为庐山最高峰的汉阳峰，距长江少说也有三四十公里，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在“江上”，为什么不是“江

<sup>1</sup>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页97。

<sup>2</sup> 肖毅、胡敏编著：《毛泽东诗词详析及墨迹欣赏》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402。

边有奇峰”而是“江上有奇峰”？看来，毛的诗句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 十、北京——上海——广州

“虽然我没有指望再见到江青，但她咄咄逼人、机智善变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要把她真实的过去传达给别人，她对自己很大程度上较为模糊的早期生活和与历史力量的越来越多的牵连进行的简短描述，应该是不足的，不能解释所有问题，使我的目标可望不可及。她只是四亿人中的一位女性，然而我感觉到她独特的阅历——普通生活和奇异经历的融合——为理解中国革命中的妇女和政治权力面临的最基本的困境提供了线索”。（P34）

“在那个晚上与江青第一次会面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我继续同邓颖超和其他妇女领导人讨论，我们的谈话连续进行了四个上午。……她在各种政治条件下都同妇女保持联系的习惯是她不同于江青的地方。江青的女性主义追求更多的还是个人追求，她更远大的政治抱负也决定了她的人生并不是仅为两性平等而斗争”。“然而我没有与江青失去联系。每天下午在我和邓颖超谈话之后，徐尔维和沈若芸两位使者就会来我的房间，继续朗读江青的讲话”（P34—35）。

“我在上海的五天访问是从八月份第三个星期的周末开始的，有一个大型的接待组来安排活动事项。在我北京的三位同伴外，又增加了上海的五位女性和一位男性，都是文艺、科学和外事管理单位的骨干。这次陪同人员的增加肯定是江青对我的访问第一次干预的结果，《人民日报》还用一张照片予以了报道”。（P36）

在上海期间，维特克被安排“参观了很多革命奇迹，包括通过针灸麻醉使妇女高兴地接受了子宫手术，同时还保持意识清醒状态”，此外，还访问了蔡元培的女儿及九届中央委员、纺织女工杨秀珍等。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访问把我们带进了上海的文化圈，这里被认为是江青的地盘，姚文元是这里的具体负责人。对具有争议的现代作家鲁迅故乡一天的参观在文学争论中结束，这些也是后来我和江青讨论的话题。我同久经论战的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的刘大杰教授就十八世纪的巨著《红楼梦》展开了讨论，后来同样又在我和江青的谈话被她提了出来。戏剧和芭蕾舞表演以及对剧团的采访都是通过姚文元安排的。

24日下午早些时候，我们采访了江青支持下从芭蕾古典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舞蹈演员之后，才精疲力竭地返回。我们的车背着夕阳向前行驶着，朦胧的夕阳很低，照出了工业化的上海的轮廓；我的同伴们向老陈看过去，她试图保持镇定，但还是掩饰不住她的激动，说道：‘我们已经知道江青同志秘密飞去了广州，她正在那里回忆她的过去和革命的历史。她将会再见你一次或两次。这几天你提出的所有有关她的问题都会得到回答。你明天乘坐从北京派来的一架飞机去广州。我必须强调这次旅行是秘密的，除了我们这些陪同人员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们将会被送到一个神话中的女性当权的王国吗？我尽力获得一点现实的感觉的时候一边默默地问自己。过了一会儿，我们都因为我们这次旅行中出现的新任务放声大笑起来，真是可笑和不可思议。无可否认，在这些事件自然发展的后面是江青必然已经严肃地决定要逐步展开她的故事。

第二天下午，我们上海的接待组来到机场为我们送行。于，老陈和我被领到一块空旷的地方，那里停着一架很大的银色喷气式飞机，机上唯一的旅客，就是从北京飞来的张颖——宣传领域的重要人物。到达广州后，翻译沈若芸，以及一位礼宾司的副司长唐龙彬<sup>1</sup>——也是我们此次任务中唯一的男性——出现在机舱门口微笑着向我们挥手。”（P36—37）

## 十一、“江青同志准备好了”

维特克意料之外的与江青在广州持续六天的长谈，是维特克中国之旅的重头戏。以下两大段译文，是维特克有关在广州与江青再次见面的部分描述。

“‘江青同志准备好了！’这句话意味着我们要离开现在的会客室，准备开车到江青的别墅去。黄昏时刻，我们的车一路按着喇叭穿过广州那人和牲畜挤在一起的混乱的街道。夜幕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到了郊区，坑坑洼洼的路上到处都是急转弯，我一点方向感都没有。通向江青的别墅的是一条狭窄曲折的小路，两边都是高大茂盛的竹丛。竹丛里面半隐半现着年轻的解放军警卫战士，刺刀明明晃晃。那栋别墅是一座宽敞的一层现代建筑，坐落在寂静的自然保护区里，被热带花园包围着：颜色鲜艳的爬墙虎、木槿，池塘上漂着的淡粉红色

<sup>1</sup> 唐龙彬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不是副司长。

的莲花，气味芬芳的木兰、茉莉和姜花，还有蝉儿有规律的鸣叫，以及小鸟毫无曲调的合奏。

别墅里面非常宽敞，但是装修很中性，由于一些明亮蓝色的花瓶和金黄色蝴蝶花以及一些涡卷型装饰物的存在才得到一些调剂，很具有当代实用派设计特点，但不属于社会现实主义或专门的政治性。在这距离北方的首都几千公里的地方，江青无须为政府事务和个人的争斗烦心，她显得温和得多，也更加放松。她穿着一件做工极为精细的绉绸做的宽松的女衬衫，配一条百褶裙，落到小腿中部，我们1950年代初的风格。我在北京见过的她的白色塑料凉鞋和手提包没有变，但是手提包的提手处缠了一圈厚厚的绒布。

‘感到紧张吗？你不应该紧张。’

‘不。’事实上，我远没有第一次见面时紧张。这次我开始做记录。因为空气很潮湿，也很热，我把袖子卷到了肘上部。

‘你太热了，’她观察到了我的动作，然后转向一位随从吩咐打开空调。空调轰隆轰隆开始启动，低声咆哮了一会儿，接着突然停了下来。”（P38）

“‘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呢？’她怂恿地问道。一直以来我最好奇的就是想看看她会怎样介绍问题和事件，我就说她作为文化事务的主管，应该保持主动性。我也知道这样的谈话多么不同于采访一位西方的或部分西化的领导人，那样的采访中我会被期待着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一些争论。此外，到现在为止，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已经很长，我认识到如果与她生活的内心动力和中国革命史无关的话，那么我所有美国式的兴趣都是不切题的。

她的生活经历是漫长的、痛苦的，也是传奇式的，她像是做梦似的开始了讲述。‘但是不要光写我，’她匆匆补充道。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她建议把她的生活经历放在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当人们谈到整个革命的全局的时候，任何个人的角色都显得很渺小。她自己的角色也非常渺小，她坚定地说。

我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与她不同的意见，也可以与她争论，这不会伤害我们之间的友谊，友谊将会永存。她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不不要扭曲她的意思。我没有赞扬或责备她的意思，我做了回答，也希望我自己同儒家和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的说教脱离开来。我说我主要的目的是精确地转达她所说的话，以及只有在直接接触之后才能够传达的对她的个性的感觉。她引用鲁迅的话说虽然她也批

评别人，但她总是更加严厉地批评她自己。人永远不要自满。她希望我不要因为这次独特的中国之旅而自以为是。不管生活经历多么不平凡，人们都必须保持谦虚。

她猜测我想了解更多关于她个人生活的情况，同时还有意地微笑着。如果是那样我们将从战争开始，因为战争的原理包含了整体上理解她过去的生活和革命的动力的线索。如果我不感兴趣，她不会把军事史强加给我。然而，她保证，她的个人陈述不会很枯燥无味。于是我们将转移到个人历史上，从孩提时代开始。

那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后来因为吃晚饭、以及移到另一个房间换新鲜空气中断了一下，她一直都不停地说，直到早上三点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自己越来越有精神，她的听众因为身体的惯性和无情的酷热已经疲惫不堪，甚至都昏昏欲睡了，但她似乎并不介意，仍然继续她的独白。

每天晚上，都是在她的警卫员和护士反复坚持，以及她两位保健医生频繁发出信号的情况下才结束我们的谈话，那两位保健医生在房间的另一端，不住地踱着步子，静静地观察江青的情况。除了她个人的服务人员外，我们这些人通常还包括徐尔维和沈若芸，她们互相称呼为翻译；宣传部副部长张颖；礼宾司副司长唐龙彬（她这一次政治任务中的唯一男性）；还有我的两位同伴于世莲和陈。我偶尔同她们交流眼神和微笑，然而江青在场的时候她们总是保持绝对的沉默——与她们平常的滔滔不绝形成强烈的反差。

第二天晚上我们移到了另一栋更大的别墅（江青还是住在第一栋别墅里），这栋别墅房间更多，可以连续不停地更换着使用，因为南方沉闷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污浊。每个空旷的房间里都备有毛巾——小的、大的，干的、湿的，热的、凉的——我们用来恢复精力，此外桌子上还有茶、香烟、几盘蜜钱、笔、文具和麦克风，以及其他录音设备。

我们持续了六天的谈话的模式是从傍晚开始，早些时候停一会吃晚饭，然后继续，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有一次，我们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和当天下午还各进行了一次额外的谈话。这样，由于江青以这种被她认为是自己特权居高临下的无产阶级风格进行谈话，她经常离题，随意漫谈，告诉我她的革命经历”。

（P41—42）

## 十二、何理良的劝阻与维特克的坚持

以下是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序言”中叙述的该书出版的曲折经过。

“本书是在江青表示希望出版后得到授权的。在公开发行之前她从未要求审阅手稿。我们第一次在北京的会面，我不是很留神，本来带了一个笔记本，但是因为太过投入而没有想到要使用。她谈到了很多方面的话题，有的几句带过，有的津津乐道。那次会面谈话内容的文字手稿两周后才交给我，她解释说是为“准确和慎重”起见进行了部分的剪辑，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周恩来总理、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到不包括毛）。就像我预期的那样，她的谈话内容中对林彪的诋毁及对她心理和身体带来的不良影响所作的评论，在官方的纪录中被砍掉了，但是已经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应她的要求，本书也没有涉及这些细节。

接下来的会面中，尽管江青保证我会像第一次那样拿到我们谈话内容的文字手稿，但我自己还是不停地做着记录。她说这些文字手稿以磁带的录音材料为基础，然后根据一份或几份的正式记录稿加以补充；但是在我们边走边谈的情况下，大多完全以速记员的记录为准。尽管我对他们的工作效率以及江青说到做到的能力有信心，我还是准备了自己的记录，包括她谈话的绝大部分内容，还有我个人对她的观察——她的外表、她的举止行为、她的环境摆设，以及其他人的参与情况。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我个人的记录比起他们官方的文稿可能更加有趣味性，因为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所做的政治性剪辑包含着内在的利害关系。

在我1972年返回美国后的一年多，通过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提供的外交渠道，江青和我互相交换了很多书籍和照片，两部故事片以及各种消息。然而那些余下的录音文稿的交付问题几个月后还悬而未决。我不时地收到传来的消息，说他们用两种语言（中文和英文，就像第一次一样）准备文稿工作量很大，但很快就好。终于，1973年5月我正式接到何理良的通知，她代表大使和其他同志说我和江青的谈话记录“太长、很繁杂”，不宜作为有关党和政府的正式报道发表。她向我保证（她和大使在其他场合多次重复了这个指令），我可以自由出版第一份手稿（这份手稿与后来江青告诉我的完整的

经历有很多关联)，也可以出版我自己的记录。但我最好不要写成“传记”形式（这样做有违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而不是领袖创造历史的信条，而且中共认为毛才是真理和智慧的唯一化身），而是‘以毛主席的观点’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两章有关江青的内容。

‘但是我同毛主席没有见过面，所以也不知道他的看法。’我回应道。

‘你可以读他的著作。’何理良说。

很多人，确实也有很多外国人都读过他的著作，但是就毛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来说，我自己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以增加的，都来自江青的叙述。我明白他们已经接到指示，要取消先前江青要我完全按照她的‘角度’来出版的委托。

由于除了第一份以外，后来的录音文稿都没有交给我，开始我还为此很烦恼，后来又觉得很好奇，因为我发现我面对的是中国领导人内部明显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对我显得不太自然的热情中，我察觉到了细微的焦虑，我知道这只是复杂、深刻的分歧和裂痕的外在表现。光看毛主席的总结讲话和指示，那些内幕总是不会为中国的公众所知。但是因为最后他们做出的不交给我江青谈话的官方版本的决定，也使得我能够出版这本书。这样我可以写下她说的话，外界的有关评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诠释，而不仅仅是作为江青的传话筒。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是其中的一部分。江青一直答应会把录音文稿交给我，而且我在中国的时候她从来没有食过言，难道是她突然改变决定不把文稿交给我吗？这个决定会不会是毛的指示？或者是那些对江青违背革命者要匿名的原则、为自己树碑立传、泄露领导人之间的残酷争斗内幕，以及她轻率地发表与毛或者是集体意见截然不同的论调而心怀怨恨的人挑拨的缘故吗？

这些不可预料的内幕更加坚定了我要采用江青提供的大量口述材料的决心。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对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保密，而且他们显然从北京知道了一些我和江青谈话的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此的焦虑也与日俱增。终于，1974年1月，何理良（她那时刚在北京呆了三个月）再次敦促我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传记形式的书，或我喜欢的称呼‘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史’。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五月公告’（1973年5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奖励。我自然是拒绝了。

出于对江青本来的愿望和对历史的尊重，我认为这些独特的记录不应该被埋藏起来，所以我继续准备我的出版计划。

中国高层领导试图压制的东西正是美国高级官员渴望知道的。国务卿基辛格的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派了代表，通过朋友和同事直接或间接地向我索取那些录音文稿和我个人记录的完整复印件。我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第一，在中国，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把我当作一个美国政府政治信息的管道，谈话里面不涉及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第二，作为一位曾去过中国的历史学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不代表任何人，在我亲自检查、确保准确和慎重的基础上，出版一本会让公众理解江青的不平凡生活及其与革命历史的密切联系的书之前，我没有义务把我的原材料交给他人。

我从中国回来之后，在斯坦福大学呆了一年，接着又在哈佛大学呆了两年。我对江青进行访谈的情况，仅仅只是其中某些部分，在学术圈中和部分公众中流传很广，因为我曾经与他们大体上谈到过她的生活、她的同志们以及中国的一些情况。从1975年深秋开始，在老同志、即将去世的老革命以及未来的领导人中进行的更多的司空见惯的内部斗争，比起平时造成了更多的公共影响，而我私下或公开地谈到的有关那次采访的只言片语，被那些主要工作就是关注中国领导集团起伏的《中国观察》的记者们收集到了一起。

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报道中，有一份说江青在与一名外国人的谈话太轻率，泄露了毛的‘机密性战略’，导致了她的衰落和下台，在那时从她的频繁露面和她的领导地位的依然如旧来看，这完全是夸大其词。第二年春天，在对周恩来认定的接班人邓小平进行公开批判期间，广州的旅行者发现了公然抨击江青的大字报（她被认为是‘反右倾’运动的幕后灵魂），指责她教唆出版了一本自传，透露了党的内部文件，而且还引用了一些‘有辱毛形象的个人私事’。1976年春天，类似的猜测在国际上传得沸沸扬扬，还包括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甚至传说我的部分手稿从我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里被偷走了，<sup>1</sup> 然后交给了中国当时主持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后来他又转手交给了毛。

这些有关中国统治者及他们私下对外接触的危险猜测也是江青的故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对过去的回顾和思索的一条永恒的主线就是，她的一生中怎

---

<sup>1</sup> 维特克原注：我从未就那次没有丢失任何材料的盗窃事件公开发表意见。



样被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所累，这些也是女性争取政治影响的必然制约因素。她曾经关切地对我谈道，她希望我和她的紧密接触以及我进行关于她的写作不会使我遭到类似的诽谤而受到伤害。

江青的情绪灵活善变，她的谈话游走于私人和公众话题之间，一会很直率，一会又很注意分寸，有时是自己的意见，有时是毛的正统思想，要解释她的人性和历史意义就显得尤为困难。本书除了直接和间接引用了她的原话外，还加入了我把她当作一个人和一个健谈的人的观察。必要的时候，我也在她的回忆里加入了一些历史文献资料。她没有必要的奉承和恭维——也是她政治风格的一部分——在书中被删去了。把她的过去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她作为主人、自述者和人民群众的榜样不可能独自完成，这在我们不太熟悉的中华文化中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在那里一位最具革命性的女人在性别禁忌方面也没有获得完全解放。此外，翻译也是一个问题（把汉语逐字逐句地翻译成英语并不是很清晰顺畅），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具有的僵化刻板，它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如果主席或者中央委员会想看到一本纯粹宣扬江青的书，他们本来能够自我协调好的，用一种他们自己选择的语言推广出去。经过我稍稍编辑修改过的采访报道，同时又带有自述回忆录的特征，从长远看不是为任何人服务，尤其不是为江青——她对世界的看法需要一些解释。就我们之间的文化和阶级碰撞和冲突来说，如果仅仅从一个记者的角度的凭着感觉匆匆做出评判，就会使她冒着失去前途的危险要揭露的她在个人和历史事件中走过的艰辛历程，变得无法探索，那些证据就变得非常不精确。我没有这样做，我宁愿用一种和她在一起的经历所需要的风格来展现她——用保留一定距离的判断来完成她的叙述以及我对她个人和她的世界的密切观察。正如她曾好几次自信地对我说的那样，我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位历史学家。”（P12—16）

维特克以上有关《江青同志》出版过程的叙述，实际上已驳斥了当年以至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大陆公开散布的有关此书的一些谬言。如199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说，《江青同志》出版后，“中央决定，派外交人员用重金买下版权” [15]，<sup>1</sup>2003年出版的《红色警卫》基本上是重复了这个流言：

<sup>1</sup> 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850。

“中共中央决定派驻外机构，用重金买下该书版权”，书既已出，还买什么版权？按维特克以上所述的实际情况应该是：1974年1月，何理良曾“敦促”维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江青传记形式的书，“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奖励。我自然是拒绝了”，维特克继续了她的出版计划。但在此过程中，何理良代表哪一方面、哪一个人向维特克提出这个要求，又是哪一方面决定不再向维特克提供江青在广州的谈话纪录，我们尚未有确切的资料。

### 十三、已死的毛泽东何能“颇为震怒”？

1977年，《江青同志》由维特克授权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在美国印刷，在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发行。该书共 549 页，除“序言”外，共分五大部分十九章，“邂逅”为独立的第 1 章，第一部分：成长期，内含四章：2、叛逆的童年；3、入党，坐牢；4、从左联到舞台中心；5、上海电影圈的留痕。第二部分：在边区，内含三章——6、在延安通向毛的道路；7、延安的大众文化；8、走向北京。第三部分：幕后，内含三章——9、五十年代的深居简出；10、北京与莫斯科；11、再梦红楼。第四部分：文化革命，内含四章——12、设置舞台；13、在游泳中学会游泳；14、反潮流；15、林彪——玩火者。第五部分：文艺界的女主人，内含四章——16、革命剧场；17、歌舞中的豪情；18、施展拳脚 19、第十一小时。

张颖说，《江青同志》共为五大部分：一、早期生活的开始；二、从上海到延安；三、50年代北京与莫斯科；四、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五、江青成为中国艺术的霸主。<sup>1</sup>对照原书，并不确切。张颖还说，维特克的书“还登了江青给她的作战地图”。<sup>2</sup>其实那只不过是 20 年前在陕北的“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江青以此来说明她是在陕北战场中唯一紧紧跟随毛泽东行动的女性，并无张颖想要提示给我们的“作战机密”内容。《红色警卫》说维特克此书“泄露了大量中国的国家机密”，<sup>3</sup>这也并非事实。《江青同志》基本上是一本个人传记，你说这本书体现了江青要树立个人形象的政治野心，自我膨胀、自我吹嘘等等，都还说得过去，但与所谓泄露机密似乎就不怎么沾边，除

<sup>1</sup>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页 176—177。

<sup>2</sup> 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页 176—177。

<sup>3</sup> 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页 211。

非你将江青的个人经历也算作国家机密。

《江青同志》出版于1977年，其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众所周知，江的丈夫毛亦于前一年去世。但据称是具“严肃性”和“绝无稗官野史以假乱真之嫌”的叶永烈的《江青传》却有如下说法：“其实，毛泽东确实尖锐地批评了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后，曾颇为震怒”。<sup>1</sup>我们难以得知叶永烈有什么史料能证实毛泽东曾对江与维特克谈话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但叶永烈说《江青同志》出版后已去世多时的毛泽东尚能“颇为震怒”，却是十足的天方夜谭！叶永烈还说《江青同志》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也属谣传，谁也没有见过《红都女皇》这本书。叶还说，《江青同志》“第一次就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sup>2</sup>，西方书籍一般不记载印数，该书按西方惯例从头到尾也没有印数记录，“三万五千册”不知从何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有更离谱的杜撰：“该书送回国内，毛泽东阅后，十分气愤，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批件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感到处理江青的条件仍不成熟，只好‘暂缓执行’。”<sup>3</sup>（后来出版的《红色警卫》又重抄了一遍该段杜撰文字）。<sup>4</sup>如此“实录”，怎不令人啼笑皆非？

笔者虽对江青素无好感，但认为，历史不能编造，即便是对江青一类国人皆骂的反面人物，也必须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将无中生有之事，加诸于一个已经失去自辩能力的死人之上。除此之外，笔者更认为，无论是在艺术的抑或是政治的舞台上，江青的演技都不怎么样，但值得深究的是，谁为她提供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机会？又是谁纵容她在这个舞台的前沿尽情地表演，而且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原载《枫华园》 第四四八期 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

<sup>1</sup> 叶永烈：《江青传》（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页472—473。

<sup>2</sup> 叶永烈：《江青传》（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页472—473。

<sup>3</sup> 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850—851。

<sup>4</sup> 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页211。

##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mailto: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